

歷史教學

Lishi Jiaoxue



一九五九年 9

中国現代史参考图片　（十四）

（中央革命博物館供稿）



图　一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經政协一屆二次会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接着在包括三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間即在全国范圍內（除少数民族地区）完成了土改。〔**图一**〕农民在讀写在黑板报上的土地改革法；〔**图二**〕划阶級大会；〔**图三**〕北京郊区的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图四**〕沒收了地主土地，农民庆祝自己翻身；〔**图五**〕燒掉旧契約，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鎖；〔**图六**〕丈量地主土地，准备分配。



图　二



图　三

歷史教學

·月刊·

一九五九年九月号（总第105期）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目录

·教学参考·

·教学問題·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編輯委員会	發行者 天津市邮局 訂購处：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定价每册0.26元
			預定价目
出版者	历史教学社（天津营口道79号）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三个月三期 0.78元 半年六期 1.56元 全年十二期 3.12元

本期印数 001—23,990



教学参考

抗日战爭時期陝甘宁边区的农業互助合作

张水良

在抗日战爭时期，特别在1940—1941年間，陕甘宁边区在經济上和財政上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一样，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曾經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紙，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員在冬天没有被盖"①。在此困境下，边区人民群众用了很大的力量来供給革命斗爭的需要，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当时所存在的物質上的极大困难，毛主席在当时曾經指出："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們的抗日斗爭还能前进嗎？显然是不能的。"②

針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生产自給"的方針，号召全边区軍民努力发展生产，实行自力更生。这是当时解决財政經济困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支持革命斗爭的根本的道路。

边区的經济，基本上是农业經济，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边区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是农产品，农产品又可以出口換取工业品。因此，要发展生产，就必須以农业为主。

但是怎样才能发展农业生产呢？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关鍵，便是組織劳动力，即"把群众組織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員起来，組織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軍"③。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曾召开高級干部会議，确定了生产是一切工作的物質基础的方針，把农业生产作为边区的第一位工作，并总結了民間旧有的劳动互助的經驗，提倡"变工"、"扎工"，来大力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从此边区的劳动互助走上了一个新的自觉的发展阶段。

"变工"和"扎工"是边区农村旧有的劳动互助形式。"变工"是几家农戶間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把他們的人力和畜力相互調剂，相互交換、帮助。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人工变人工：二、三家缺乏劳动力的农戶，为了使大家的耕种收成都免誤农时，就組織起来互相进行帮助。結算时一工抵一工，多出了工的由少出了工的补給工錢。(二)人工变牛工或牛工变人工：有些农戶畜力强而劳力弱，有些农戶劳力强而畜力弱、或者没有畜力，便实行变工。通常多是三个人工变一犋牛工，一犋牛工变三个人工。(三)牛工变牛工：两家农戶各有一头牛，都不能单独耕地，两家商量把两头牛"伙格"在一起成一犋，輪流使用。(四)集体养牲口：几家貧苦农戶，都无力单独买一条牛或一头驢，大家共同出錢买，买来之后共同所有，共同喂养，耕作时共同輪流使用。(五)生产技术上的变工：有些农民会做这样的农活却不会做那样的农活，如有的会翻地却不会下种，于是进行互助，取長补短。"扎工"是一种集体的雇工的組織，許多出雇的短工共同組織在一起，向外出雇。这是一种单純人力的集体劳动的組織，流行于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雇短工比較困难的地区，主要分为"走馬工"和"朋工"两种。参加"走馬工"的都是自己没有庄稼而需要出卖劳动力的人，他們組織起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893——894頁。

② 同上，第1109頁。

③ 同上，第931頁。

来，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象走馬一样，哪儿工价高就往哪儿走。参加"朋工"的多半都是有些庄稼的人，不能跑得远，給雇主做完工之后，大家互相帮助，等待大家的活都做完后再向外出雇。

无疑地，这些旧有的劳动互助組織，对于那些缺乏劳力、畜力、农具的农民，在农忙季节能起一定的調剂作用；但是，它只不过是貧苦农民在旧时代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因为在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下，农民无法提高生产力去解脫經济上的极端貧困。在人民群众已經掌握了政权的边区，經过党和政府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这种变工互助，"其形式和內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①。

这种新的变化是从高干会議时开始的。在高干会議前，整个边区除了个别地区如延安等县外，在大部分地区的劳动互助都还没有加以組織推广。在高干会議上，毛主席做了"經济問題与財政問題"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各县应以大力組織劳动互助社，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②。这就引起了党內外对互助合作运动极大的重視。从此以后，全边区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开始組織起来，成为劳动合作。1943年組織在劳动合作之內的完全劳动力有81,128个，占完全的农业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四③，比过去至少增加了四、五倍。有些地区，組織起来的劳动力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如将个别地区过去的劳动互助組織数量和1943年春的数量作个比較，更可以看出高級干部会議后劳动互助发展的规模④：

地名	项目（数目 / 时間）	过去	1943年春	1943年春为过去的倍数
同宜耀	变工个数	22	134	6.09
	参加人数	350	1,504	4.297
淳耀	变工个数	25	193	7.71
	参加人数	117	2,304	19.6

"农民由于組織起来成为集体劳动的合作社，就大大地节省了人力、畜力和工具；就在合作社內部和外部掀起生产竞賽，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时間并有兴趣集思广益地改进生产技术；最后，就不仅改变农民的生产关系，且能提高他們的政治觉悟，改进他們的文化生活。"⑤这样性質的合作社就有社会主义因素。实际上在各地已陆續出現了一些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和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例如吴旗等地的合作农場：牛犋、人力、土地（包括旧有的熟地和新垦荒地）完全打在一起，集体劳动，照股分粮。又如安塞县高家坪和小樵湾等地的集体开荒队：按工入股，集体分粮，土地归众公有，成果按劳分配。这两种互助合作組織形式在当时还仅是很少数，但它却是农民群众一种新的創举，它不但表明了边区农民群众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已在迅速增長，而且指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未来方向。

組織起来劳动互助的实例活生生地給农民証明了它比个体經济的巨大优越性，劳动生产率的比較是最好的例証。在边区一般的变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从实际劳作的效果来看，一个劳动力一年可耕种十五垧地，但若三个劳动力变工劳动，一年就可以耕种七十垧地，四个劳动力更可以耕种一百垧地。在鋤头次草时若是一个劳动力一天可以鋤一亩的活，那么九个劳动力变工劳动一天就可鋤十四亩至二十亩。

为什么集体劳动能把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么高呢？馬克思曾經說过："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并且創造了一种生产力，那就其自身說，必須是集体力。"为什么合作能創造集体力呢？因为"与个别互相分开的劳动日一个同样大的总和比較，結合的劳动日会生产較大量的使用价值，从而，减少生产一定量效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間。无論在一定的場合，它是怎样取得这个增进的生产力。……結合劳动日的特别的生产力，总归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它总是由协作自身发生的。劳动者依計划与他人共同工作时，他就把他的个人的限制打破了，把他的共体能力展开了"⑥。

劳动生产率显著的提高，就使边区的耕地面积

---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79頁。

② 毛主席："經济問題与財政問題"，"毛澤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71——772頁。

③ 見林伯渠："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結"，"陝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編"（續編），第30頁。

④ 見史敬棠等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6頁。

⑤ 同③。

⑥ "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89頁及394頁。

不断地扩大，粮食收获量不断地增加①：

年份	耕地面积(亩)	植棉(亩)	粮　食(石)
1942	12,486,937	94,405	1,680,000
1943	13,387,213.3	150,287	1,840,000
1944	不　　詳	不　詳	2,000,000
1945	15,205,553	350,000	

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大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且还保障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同时，由于机关部队亲自动手生产自給，还使得农民負担的公粮逐年下降，例如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降为16万石，1945年降为12万石②，这就使人民生活得到更多的改善。这样，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机关部队生产自給了一部分，就解决了全边区部队和工作人員的衣食等供应，渡过了困难，支持了艰苦的革命斗爭。

边区原来是一个“气候寒冷，雨量稀薄，灾旱时至，童山濯濯”貧瘠荒凉的黄土高原，經济基础极端薄弱，而在短短的几年时間，且又是处在內外敌人重重封鎖包围的情况下，能发生这一重大的变化，这是毛主席“組織起来”互助合作理論的光輝胜利，也是边区劳动人民創造力的伟大表現。

劳动互助不仅是群众农业生产的組織，又是群众自卫动員对敌斗爭的組織。1943年3月起，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企图閃击延安。为了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很多变工队都轉变为自卫軍、担架队、公粮运輸队等組織。淳耀县模范白源村，全村組織了一个普通自卫軍排，分三个班，共四十人；三个担架队十五人；另外又組織了一个基干班，十个人③。自卫軍日夜輪流在边境站崗放哨，不让一个坏分子混进边区。为了更快更好地完成公粮任务，以便支援革命斗爭的紧急需要，安塞县魏家塌的大变工队，把全村变成碾送公粮的变工队，用三匹馬、两头騾子、八头驢碾米，二十条牛专門馱送，白天由十个妇女輪流看碾，夜晚由男子代替，抽十个劳动力专門送，这样很快地就完成了公粮任务④。

上述事实表明，这种能为群众謀得物質利益、适合群众要求的劳动互助組織，是不可战胜的群众組織，有了这种組織，边区軍民不但能在經济上粉碎敌人的封鎖，使边区农村經济日益繁荣；而且能在軍事上打退敌人的进攻，把革命斗爭形势継續推向更新的高峰。

除了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合作社外，党还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領导人民群众組織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即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綜合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費合作、运輸合作、信用合作）、运輸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这四种合作社結合起来，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就使边区农村經济呈現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毛主席对合作社、特别是延安南区式的綜合性合作社，在当时組織与发展人民經济方面所起的作用予以很高的評价。毛主席說：“地广人稀，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經济的边区，要貫徹政府的經济政策，組織与倡导人民发展經济，就必須依賴眞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紐带作用。因此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經济的重要工作之一。”⑤

边区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創造了丰富的經驗，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树立了光輝的榜样，因而在毛主席“組織起来”发展生产的伟大号召下，各根据地的农民群众就风起云涌地响应，掀起了一个以劳动互助为中心的生产热潮，获得了巨大的成績，使解放区的革命斗爭形势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1943年11月，毛主席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所做的“組織起来”的著名演講，对这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經驗給以极高的評价。毛主席說：“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⑥毛主席在当时就从边区的劳动互助預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将来在全国范围內的发展。毛主席說：“这办法……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經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⑦事情正是沿着毛主席所指示出的道路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农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在党的領导下，遵照毛主席“組織起来”的英明指示，在短短的几年內就实現了合作化。而在1958年，全国农村又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它比合作社更先进更优越，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組織形式。

---

① 表中材料来源：“抗日战爭时期解放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頁；“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第254頁。
② 見“抗日战爭时期解放区概况”，第17頁。
③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第287頁。
④ 同上，第222頁。
⑤ 毛主席：“經济問題与財政問題”，“毛澤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90頁。
⑥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35頁。
⑦ 毛主席：“論合作社”，“毛澤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89頁。

英法兩国資产階級革命的区别

王 荣 堂

对于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和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区别一直是我們初学世界近代史者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的确，这个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搞清这两次革命的区别，就难以深刻理解这两次革命的实質。因为“人們总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質。”①所以，搞清这两次革命的区别，对于我們进一步理解英法早期資产阶級革命的規律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当然，英法两国早期資产阶級革命的历史是异常复杂而曲折的。要想彻底弄清它們之間的区别并不容易。在这方面我的学习也不够，只是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就正于讀者。

英国革命大致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英国資产阶級在革命中不是和人民結成联盟；而是和新貴族結成联盟，来完成这次革命的。

这个特点是和革命前英国社会經济与阶級关系的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的。任何資产阶級革命“通常是在較为現成的資本主义經济形式已經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內部生長并成熟了。”②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是如此；而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也是这样，不过，革命前英法两国資本主义結构在封建社会內的成長，却不一样，而各有它們自已的特点。英国資本主义結构在封建社会內成長的特点，主要是它深入到农业。早在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年中，在英国农村里就已开始了圈地运动。十六世紀，英国圈地运动的規模更为扩大。貪婪无饜的地主最初强占公社的荒地、牧場与森林，以后便把大片耕地变为牧場或农場，无情地驅逐佃农。这种以暴力剝夺了农民的土地，使生产者与生产資料分离的圈地运动，在英国发生得最为残酷，也最为典型。因此，它破坏了英国的封建經济基础，促成了农业革命；同时，它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破坏了自然經济，扩大了国內市場，从而推动了資本主义經济的发展。由此可見，英国資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內的增長是伴随着农村的巨大变革发展起来的。

正由于革命前的英国經济具有这一特点，所以革命前的英国社会阶級关系也就与法国有些不同了。在英国出現了許多資产阶級化的貴族，即新貴族。新貴族殘暴地剝夺农民土地，进行大量圈地，把圈占的土地用以經营牧場或农場以滿足市場的需要；或者将土地出租給农业資本家，收取資本主义地租。因此新貴族“不但不反对工业底发展，相反，力图从这发展中取得利益。”③这样，新貴族在經济上和資产阶級利益便趋一致，他們和資产阶級一样，也反对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封建政策。此外新貴族多半是从封建貴族分裂出来的。在表面上还是“帶劍的騎士”，保持紳士的名銜和威仪。但是，新貴族的骨干主要是中、小貴族。他們的土地是国王或大封建主所授，不算私人财产。他們領有土地的条件是向国王或大封建主交納騎士捐、継承税和其他封建貢納。当他們的經济和資本主义发生联系以后，便想不断地增殖資本，追求更多財富，因此，他們企图摆脫国王或大封建主的封建束縛，把土地变成私人的財产，亦即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成資产阶級所有制。新貴族这种企图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有好处，基本上符合了資产阶級的要求。这样，新貴族在政治上自然就成为資产阶級的代理人，在革命中也就成为資产阶級的同盟者。

革命前英国的城市工商业資产阶級势力并不象新貴族那样大。因为十七世紀初，英国資本主义工商业水平还不太高。有些工业的技术与質量既不如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298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頁。
③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頁。

荷兰，也不如法国；在采矿方面还不及薩克逊和瑞典，在商船吨数方面，也不及西班牙。十七世紀英国所以能发生資产阶級革命，主要是农业的变革和大批新貴族的出現，而在資产阶級与新貴族联盟中新貴族还占居主导的地位。出身于中等新貴族的克伦威尔所以能成为英国资产阶級革命的領袖，其原因也在于此。

英国資产阶級在革命中旣与新貴族結成同盟，領导了这次革命，其結果必然出卖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可能与人民群众結成同盟。因为新貴族的經济利益主要是土地。他們反对封建专制的統治在于取消騎士領有制，把土地变成名符其实的个人財产。因此，他們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

其次，英国的封建专制統治不若法国那样强大。英国到革命时还保存着国会。国会的上院是封建貴族的代表，而下院主要是中、小新貴族的代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下院反映了資产阶級的要求。英国国王没有常备軍，必須国会撥款才能建立雇佣軍。因此，新貴族可以利用国会对付国王。此外，英国地方自治机关很有势力，这些机关也多半掌握在中、小新貴族与富商之手。所有这些說明英国的封建王权还不太集中，它較法国专制統治軟弱得多。除此之外，在革命中，英国没有遭到国际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法国虽想动手，因国內发生投石党运动也未得逞。英国王权旣然軟弱，而又没有国外反动势力武力支持，所以英国資产阶級与新貴族在与专制国王斗爭中，較易取得胜利。在这种条件下，害怕人民取得胜利的英国資产阶級与新貴族，更不想与群众結合起来，而只利用人民群众这一决定性的革命力量，来达到他們的目的。同时，十七世紀初，英国工人阶級没有成熟，城乡劳动者的觉悟还很低，这也成为資产阶級与新貴族能够利用群众运动、实現他們的目的的原因。

英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十七世紀的英国还刚开始脫离中世紀，資本主义生产水平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人們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脫出宗教的影响。正因为“群众的感情，只是用宗教的食粮养育起来的；所以，为了引起热烈的运动，它（指資产阶級）本身的利益必須在宗教的外衣下表示出来。”①在革命前，英国还没有形成非宗教的思想体系，在革命过程中，資产阶級和平民群众的思想家在維护自己的阶級要求时，总是求助于宗教，援引圣經的話作为根据。例如反映貧农要求的掘土派領袖、烏托邦共产主义者溫斯坦尼，在他所著的“自由法”一书中，虽然倡导土地公有，人人劳动和都应得到自由的学說，但他反对革命的暴力，信賴說服，并引用圣經来論証自己的观点，因此充滿了宗教的色彩。

十七世紀初，英国虽然已出現过唯物論哲学，但是它并不适合于当时資产阶級革命的要求。例如霍布斯在他写的“利維坦”一书中，論述国家起源不是根据神意，而是根据契約。同时霍布斯又肯定了国王权力的万能。因此，这种学說，旣触犯了敬神的信仰，不合乎当时人民思想要求，也“因为它的反資产阶級的政治联系”②不合乎資产阶級的要求，这样，英国資产阶級在革命中就不能用当时唯物論哲学来号召，必須用一种适应于資产阶級而又能合乎当时人民思想水平的新宗教，来反对維护君权的英吉利教（亦称国教）。于是加尔文教（在英国称为清教）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英国資产阶級用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清教与英吉利教不同。英吉利教的教义主張繁杂的封建等級仪式，維护君权神授；而清教的教义則主張簡化仪式，取消宗教中的等級制度，要求共和与民主。因此，清教“正适合当时資产阶級底最激进部分的要求。”③同时随着資本主义在英国农村中的广泛增長，清教也广泛地深入到农民群众和城市市民之中。当时英国不仅資产阶級与新貴族，就是广大的城乡小生产者与貧民，也多半信仰清教。于是“新教的教派，供給了反对斯多亚德們（十七世紀的英国皇朝）斗爭的旗帜和战士，选拔了进步的中等阶級底主要战斗力量。”④克伦威尔的鉄騎軍和后来的国会新模范軍多半都是由信仰清教的自耕农与手工业者組織起来的。这种軍队的士兵，“在討論政治問題的时候，他們引用圣經的話；在备准战斗的时候，他們作祈祷，在出发战斗的时候，他們歌唱圣詩。”⑤总之，他們在所謂“正义的、上帝的事业”的斗爭中，表現出忘我的英勇斗志。清教就这样地成为英国革命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俄文版，第675頁。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頁。

③ 同上引书，第19頁。

④ 同上引书，第22頁。

⑤ “新編近代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頁。

的外衣，成为英国資产阶級战胜国王与封建貴族的理論与旗帜了。实质上，在这种宗教外衣之內包藏着阶級利益的冲突，具有資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矛盾的实质，这是資产阶級对封建主一次不可調和的革命斗爭。英国資产阶級利用当时英国人民大众觉悟低，而通过宗教的号召，借助群众力量，来达到他們的目的。

英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是以大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間的妥协結束这次革命，沒有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与封建傳統，因此不够彻底。英国革命这一特点是与前面所說的二个特点有着不可分的密切关系。

在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中，如同在其他資产阶級革命中一样，战胜封建制度的是城乡劳动群众。恩格斯說："正是由于这些小土地所有者与城市平民分子底参与，斗爭才能达到彻底的結果，并将查理第一推上断头台。"①但是，当时英国城乡劳动群众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并受着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因此在革命中，只是受着資产阶級与新貴族的利用与欺騙。作为新貴族与資产阶級代表者的克伦威尔就是一个善于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来为資产阶級与新貴族謀利的資产阶級革命者。例如在革命开始之初，克伦威尔利用宗教热情把自耕农与手工业者組成为鉄騎軍和后来的新模范軍，使农民发揮了忘我的战斗精神，从而打敗了王軍。当国会軍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克伦威尔便对农民运动加以无情的鎮压，反对任何有利于农民的改革。当独立派与長老会派进行斗爭时，克伦威尔为了团結群众，接受了平等派所提的"人民公約"。但是当战胜反革命的長老会派与一切王党之后，作为独立派領袖的克伦威尔便踢开平等派，否定了人民公約，把共和国政权完全变成資产阶級与新貴族的統治工具。这个共和国在政治上并沒有实行民主制度，在經济上也沒有实施任何有利于城乡劳动者的措施，并先后絞杀了平等派与掘土派的民主运动。在1649年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后，革命的上升路綫便告結束，而开始向下降路綫发展。因此英国革命沒有发展到象法国雅各賓专政时期那样最高点。

为了制止不断的群众反抗运动，資产阶級与新貴族便把共和国变为克伦威尔的軍事独裁。克伦威尔死后，軍事独裁已不能巩固他們的政权，于是資产阶級与新貴族便为旧王朝复辟打开了大門。复辟王朝损害了他們的利益，于是他們便背着人民，偷偷地来个"宫廷政变"（即1688年政变），把英国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这个政权的阶級本質就是"地主式的和資本家式的貨殖家"②的联盟独占了統治。政治的战利品——职位、高官、厚俸——仍留在大貴族世家的手里，其条件是充分維护金融的、工业的及商业的中等阶級底經济利益。……从这时起，資产阶級已是英国統治阶級底謙遜的可是是公認的一部分了。"③这个結果意味着在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中，英国資产阶級对貴族阶級沒有取得完全的胜利。革命的結果只是导致資产阶級上层分子和資产阶級化的貴族分子之間的妥协。因此，英国革命无論在消灭封建經济制度上，或革命后建立的資产阶級国家政权上，都是不够彻底的。

就消灭封建經济制度而言。在革命中，資产阶級与新貴族只宣布取消騎士捐，废除土地繼承稅和土地购买稅，而保留农民对地主交納的封建捐稅，保留封建的注冊产权，即依据簿籍取得土地租佃权的农民（即主簿持有农）仍旧要向貴族地主交納以前所規定的封建貢賦和担負从前所有的封建义务。这种措施只是片面地取消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而沒有取消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除此之外，独立派共和国，把国王、教会及王党的土地沒收以后，整块地加以出卖，这只便利了新貴族与資产阶級，农民一点也得不到。新貴族得到土地后，便进一步扩大圈地，使农民継續遭到破产。誠如恩格斯說："农民却正是这么一个阶級，它在胜利之后，却反因这一胜利的經济結果而破产了。"④这种結果主要是英国資产阶級在革命中与新貴族結成联盟，从而使英国革命具有保守的和反农民的性質。

就政治制度而言也是不彻底的。革命后在英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既保留了国王，在国会中也保留了貴族院。內閣对国会負責，国会成了英国最高权力机关。国会是由資产阶級代表的众議院和貴族代表的貴族院組成的，因此，它体現了大資产阶級与大地主分享政权的統治形式。这种政治制度体現出"在英国，革命前的制度和革命后的制度之間継承的联系，地主和資本家之間妥协，表現于訴訟程序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20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14頁。

③ 同①引书，第21頁。

④ 同①引书，第19頁。

底承継以及封建法律形式底被尊重地保存着。”①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比較起来，大致也有三个特点，可是法国的特点則与英国完全相反。

法国革命的第一个特点是“資产阶級在革命中和人民結成同盟，来完成这次革命的。这个特点主要因为革命前法国經济特点与阶級情况与英国有所不同造成的。革命前的法国資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內的成長，沒有广泛地深入到农业。十八世紀下半期虽然在法国东北沿海各地农村中曾有过小規模的圈地运动，在农业中資本主义因素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直到革命前，法国的农村几乎还都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的封建特权和地主对农民极为繁重的封建剝削。革命前的法国农业非常落后，耕种方法一如中世紀沒有多大改变。在这种經济情况下，革命前的法国阶級关系便与英国大不相同了。法国沒有出現象英国那样多的新貴族。封建貴族与僧侶的权势很大，几乎所有的貴族与僧侶，基本上都是保守的和反革命的。他們在农村里有自己的封建大地产，并依靠这种地产殘酷地压榨农民，过着寄生腐化的生活；在政治上他們享受特权，不担負封建义务，甚而不納稅；在政府中，他們位居要职，充任軍官和把持教会。因此法国的封建貴族与僧侶都是法国封建专制統治的支柱。革命前法国的封建特权阶級虽然也有分化情况，但是，貴族中資产阶級化的阶层是非常小的。

革命前的法国資产阶級与英国的資产阶級也有些不同。法国資产阶級在政治上无权，社会地位与城市平民和农村农民一样同属于第三等級。有些发了财的法国資产阶級如銀行家、包稅商人和經营房产的大商人等多半巴結封建势力。他們用金錢购买封建头銜和官爵而不断地貴族化。資产阶級中不断貴族化的阶层在革命前的英国固然也有，但不若法国之多，因此，資产阶級不断貴族化也是法国的特点。由于上述諸因，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发生就必須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得較英国更为成熟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本主义結构在封建社会內的增長远較英国革命时为充分。例如呢絨、絲織和其他一些工业部門的資本主义手工工場都获得广泛的发展；在冶金业、金属加工业和煤矿等工业部門，集中的手工工場很占优势。早在革命前，有些工业部門已开始使用了簡单的机器。法国社会經济发展到这种程度之后，如果不根本摧毀封建专制制度，不改变农村的封建落后状态，不使經济政策服从資产阶級利益，那末資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一些貴族化了的資产阶級外，那些新兴的工商业資产阶級，尤其是中、小資产阶級仇視封建主义，主張在法国进行根本的改造。革命前，由于封建統治的殘酷压迫而引起的城乡人民剧烈的运动便成为法国資产阶級用以发动革命的社会力量。

法国資产阶級面临的封建敌人是非常强大的。法国封建貴族与僧侶既然是封建专制統治的支柱，那末法国国王的权力就易于集中。在中央有受国王統一指揮的官僚机关；在地方有国王派的总监代理国王进行統治；法国国王既有常备軍，也有不受任何牽制的独断独行的最高权力。在法国沒有象英国那样的国会。旧时代的三級会議从十七世紀初就沒有召开过。此外，在革命时期，欧洲各国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用武力支持法国国王。法国資产阶級要想推翻这样的敌人，自然要比英国困难得多。在法国既沒有象英国那样的新貴族和資产阶級共同进行革命，法国資产阶級要进行革命，势必与人民群众緊密地結合起来。当时法国还沒有成熟的、足以威胁資产阶級的无产阶級。法国既然沒有象英国那样的新貴族，所有貴族基本上都是反革命，那末在革命的改造封建社会所有制时，就可以不考虑或少考虑貴族的利益，这样，革命的法国資产阶級在革命中，就能够与人民結成同盟。尤其重要的是十八世紀末法国人民大众的思想水平較之十七世紀初英国人民高得多。革命前法国人民在启蒙学派思想的影响下，在資产阶級革命胜利后的英国和取得胜利的北美独立战争的影响下，已具有了改变自己处境的决心和觉悟。因此，法国資产阶級就不可能象英国革命时資产阶級只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他們必須眞正地解決一些劳苦大众的要求，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是法国資产阶級在革命中和人民結成同盟的客观条件与原因。

法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完全丢开宗教外衣，在公开的政治基地上作战的起义，这一特点是和法国革命前的社会阶級关系及其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

革命前法国的封建王权既然非常强大，維护这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頁。

个王权的天主教会势力也深入到各地。恩格斯說：“它（指天主教一行者）把神赐的圣光加于封建制度之上。这个教会仿效封建的等級制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的等級制，并且終于使自己成为最大的封建領主，……要在每个国度內起来和世俗的封建制度斗争，就必須首先毁灭这个它的中心的神圣組織”。① 由此可見，法国資产阶級要想推翻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必須首先摧毁天主教的权势。法国与英国不同，因为法国資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內的增長没有广泛深入农业，而新教也不可能在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傳播。同时，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国反抗封建专制統治的剧烈的群众性斗争，也冲淡了維护君权的天主教学說在人民中的影响，法国人民逐漸怀疑宗教学說的眞实性，而有了无神論思想的萌芽。

尤其重要的是法国革命所处的时代与英国不同，在十八世紀末法国革命时期，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較十七世紀英国革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如数学、机械学、天文学与物理学也有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以前，科学是教会的恭順的奴婢，教会从来不允許科学跨出宗教信仰所限定的界綫之外，因此，那时是完全没有科学的。現在科学暴动起来反对教会了；資产阶級需要科学，它参加了这个暴动。”② 所以，革命前在法国就已形成了資产阶級的、世俗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出現了平民群众的思想体系。例如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国的唯物論等，都对天主教与君主专制做过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法国的唯物論。它与英国唯物論不同，虽然它还是机械唯物主义，但它不仅批判了宗教和神学，更批判了一切封建制度。它忠实于一切自然学說，仇視迷信，而是一种战斗的无神論。“它的影响是这样巨大，以致在大革命时，这个由英国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說，給共和党和恐怖党拿来作理論的旗帜，并提供了‘人权宣言’的底本。”③ 至于法国平民群众思想家較英国革命时期的平民群众思想家就更富有战斗性了。例如梅里埃不仅提出土地公有，还号召农民革命。所有这些思想家的理論在革命前就与封建主义进行了尖銳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思想中起了組織与动員作用，为革命創造了革命思想的前提。因此，革命前法国資产阶級思想体系与平民群众思想体系的成熟，終于使十八世紀末的法国革命有可能抛弃宗教外衣，而以公开的政治斗争出現。

正由于法国資产阶級在革命中与人民群众結成联盟，并丢开宗教的外衣在政治上与封建国王作战，所以法国革命便出現了与英国不同的第三个特点。法国革命是第一次眞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至使交战的一方即貴族完全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資产阶級获得完全胜利的起义。

法国革命这一特点主要是法国人民群众在整个革命进程中自始至終起着主导作用造成的。作为一个剝削阶級的法国資产阶級也和英国一样，在反封建斗争中并不是很坚决的，它处处表現出懦怯与动搖。法国大資产阶級根本就没想坚决进行革命。革命爆发之初，銀行家、包稅商，大农場主等的代表，首先篡夺了政权，企图在保留君主制条件下，实行政治改革，大資产阶級这种妥协态度，不止一次地为革命造成危机。法国大工商业資产阶級取得政权后，仍然不想彻底地消灭封建势力，也不想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即使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关头，大工商业資产阶級也不去团結群众，不采取坚决的革命措施，而是找寻与封建势力妥协的途徑，从而助長了反革命的气焰，陷革命于险境。可是，每当資产阶級对革命表示懦怯、动搖，为革命造成危机的时候，法国人民就挺身而起，勇敢地打退了一切反对革命的敌人，保全了革命，并推动革命前进。恩格斯曾写道：“資产阶級这一次也同往常一样，在保护其本身的利益上也过分懦弱，……从攻占巴士底开站，平民就为他們执行了全部工作……如果7月14日，10月5－6日，8月10日，9月2日以及其他各次没有平民的参加，封建制度必定会战胜資产阶級，同宫廷結成的联盟还可能把革命鎮压下去，……如此看来，只有平民才完成了革命。”④ 由此可見，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下，消灭了反动的貴族与僧侶，并摧毁一切国內外反革命的进攻，因此它是沿着上升路綫发展的，最后把革命推到雅各賓专政阶段。关于雅各賓党人，列宁曾写道：“眞正的雅各賓党人即1793年的雅各賓党人在历史上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是‘有人民拥护的雅各賓党人’，是有革命的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有当时革命的先进阶級拥护的雅各賓党人。”⑤ 因此，雅各賓派（即資产阶級民主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頁。
② 同上书，第18頁。
③ 同上书，第22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俄文版，第81頁。
⑤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96頁。

派）依靠工人、农民和小資产阶級，采用了革命的、平民的方法，終于粉碎了資产阶級革命的內外敌人，保証了革命的完全胜利。因此，在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中，消灭封建制度与革命产生的政治制度，都較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彻底得多。

就消灭封建經济制度而言。例如雅各賓派的土地法。把沒收的国王、教会和亡命者貴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加以拍卖，款项可以在二十年內分期付清。土地法的另一規定又把貴族强占去的公社土地，归还給公社，并可以分給农民。把各种封建文书加以焚毀，并无償地废除一切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这个土地法較彻底地破坏了貴族所有制，使小农經济得到了发展。这就意味着法国革命的結果，在变封建所有制为资产阶級所有制过程中，不是把土地交給貴族，而是使农民得到土地。法国农民虽然沒因此而摆脫被剝削的命运，但他們却暂时地得到了土地，并丟掉了封建的剝削与压迫。在資产阶級革命中，这是一个比較彻底的現象。

就政治制度而言，雅各賓派所建立的政权，是革命的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政权中，旣沒有国王，也沒有貴族，只有根据普选制产生的国民大会，和国民大会选出的行政机构。在选举权上沒有財产的限制，因此，它給予了人民以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虽然人民还沒有获得眞正的社会平等，还不能彻底免除貧困与剝削，但它对于資产阶級革命任务的解决是比較彻底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法国，相反地革命与过去的傳統完全地断絕了关系，消灭了封建制度底最后遺迹，并在 Codccivil（‘民法’）中使旧‘罗馬法’巧妙地适应于現代的資本主义关系——它差不多是馬克思所称为‘商品生产’的經济发展阶段之法律关系底最完备的反映——它适应得这样巧妙，以致革命的法国‘民法’，直到現在还是一切国度（連英国也在內）用来改革財产法所根据的范本。”①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頁。

喻　皓

十世紀我国著名的建筑师。他的高超精巧的建筑技术，得到当时人民的称頌。他曾在北宋国都开封主持一个木塔的修建工作。在建塔前，他先作一模型。989年木塔建成，有八个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比开封其他塔都高，样式也很壮丽。塔初成时，看起来有些向西北偏斜。人們問他，他說：“京师地平无山，又常刮西北风。不到一百年，塔自然会被风吹正。”可見他設計周密，能預見到自然力对建筑物的影响。可惜木塔在1044年因失火被焚毁。1049年开封的建筑工人又仿該塔形式重建一鉄色的琉璃磚塔。現在还保存着，去年（1958）我們又将它加以修繕，恢复它原来的面貌。这个塔一般称为鉄塔。它虽不是喻皓的原物，但从它坚牢的結构和精美的图案看来，仍然可以想像出木塔的規模。这可以說明我們祖国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喻皓又根据他多年实际工作的經驗，写成了“木經”一书，詳記木构建筑的方法，为当时一般建筑工程所遵用。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統的建筑学著作。該书已失傳，北宋沈括所著“夢溪笔談”中曾加以簡略的介紹。十二世紀初李誡所著“营造法式”中，也曾参考和引用过这一著作。（开史）



日本人民阻止修改和爭取廢除日美「安全條約」的斗爭

伊文成

自从去年10月以来，日本人民为反对日美反动派阴謀修改日美"安全条約"，掀起了規模巨大的反抗怒潮。現在，这个斗争还在繼續发展着。日本人民阻止修改和爭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的斗爭，是日本人民長期以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占領、反对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的斗爭的延續。战后十余年来，日本人民为了反对美国占領日本、反对美国利用日本侵略亚洲，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爭。因此，日本人民反对修改和爭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的斗爭，是有其深刻的的历史原因和現实的政治的經济的原因。

一 日美"安全条約"的反动性及日美反动派修改条約的陰謀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初期，受盟国委托占領日本的美国，并没有忠实地执行波茨坦宣言和远东委員会的决議，而是利用这个时机加紧控制日本，采取保持日本旧秩序的方針，因而作为日本軍国主义复活基础的垄断資本集团被保存下来。特别是美蔣勢力被中国人民从大陆赶出之后，美帝国主义集团更集中力量扶植日本反动势力，以充当美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亚洲人民和策动新战爭的工具。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是美国侵略集团备战計划中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①，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也并不否認这一点，如美国記者馬克·蓋因透露說："在过去的一个世紀，中国是我們外交政策的重点。可是，現在这个重点正向日本轉移。因为共产主义的波涛正掩蓋着中国全土"②。1948年初，美国陆軍部長罗雅尔公开宣布：現在美国"对日政策的方向，在于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这显然是要把日本变为美国的"远东兵工厂"和要日本人充当侵略战爭的炮灰，也就是实行其"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以便美国火中取栗。而且日本垄断資本也企图利用这个机会，自愿充当美国侵略政策的忠实奴仆，企图借此达到其复活和重溫"大日本帝国"的旧夢。

美帝国主义者知道：要想重新武装日本和强迫日本提供軍事基地，必須及早締結对日"和約"。因为美国在日本扩建軍事基地和发动侵略战爭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日本人民激烈的反对、并且遭到各国輿論的制裁。因此，美国国务院認为采取"媾和"的形式，反而会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实际占領，并且便于重新武裝日本。于是，美国反动集团不顧中苏两国政府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竟粗暴地破坏了波茨坦宣言的原則，于1951年9月4日同日本吉田反动政府签訂了片面的非法的旧金山"和約"。

在旧金山"和約"签字的当天下午，美帝国主义者赶忙把日本首相吉田茂带到旧金山一个美国兵营的房間里，签定了特殊的軍事条約——日美"安全条約"。这項以侵略和奴役日本民族为目的的条約，确定美国拥有"在日本国內及周围駐紮美国陆、海、空軍的权利，"③以便在远东和其他地区进行軍事挑衅。条約規定美軍拥有鎮压日本人民的民主运动的权利。条約还規定未經美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单方面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約，这意味着美軍可以无限期地駐在日本，对日本的軍事、政治和經济进行全面控制。这个軍事条約实質上就意味着美国繼續占領日本，并使日本陷于半被占領国的地位以及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大的侵略据点。

美日反动派于1952年2月28日所签訂的"行政协定"，把日美"安全条約"的內容作了具体的規定，其中心內容即允許美国在日本各地拥有建立軍

---

① 周恩来总理1956年1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二屆全国委員会上的政治报告。

② 馬克·蓋因著："日本日記"，下卷，日文版，第215頁。

③ 日本"六法全书"，日文版，2238頁。

事基地的权利，可以随便利用日本港口、机場和通訊工具，并且可以向日本运进原子彈和氢彈。“行政协定”規定，美国軍人、文职人員及其家属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不受日本法律的約束。此外，規定日本人民每年要分担美国駐軍費用，美国借此有权干涉日本所謂“防卫分担費”的予算。在附加的一項条文（24条）中，还規定美軍对日本人民民主运动进行鎮压的程序①。

总之，美帝国主义通过日美“安全条約”和“行政协定”，已經完全达到控制日本的目的，并为重新武装日本和变日本为美国軍事基地廓清了道路。

美帝国主义在“安全条約”以及“行政协定”的庇护下，加紧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从1953年到1955年这一时期，基地数目竟达700多个以上②。近几年来，美国为了配合原子战略計划，对原有基地作了某些調整，并扩大了某些基地面积。目前美国在日本的軍事基地有101处，駐日美軍总計7万人③，其中空軍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竟达4万多人。而美国的空軍基地还在不断扩大中，美国企图把日本变成核战争基地。

美帝国主义者把它这种侵略活动，說成是为了日本“安全”和防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是，慌話究竟不能掩盖事实。連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都不得不招認这点，他說：“美日安全条約，不是慈善事业，当然不是为保障日本的安全”。美帝国主义者不过是把“防共”和“反共”的口号当作烟幕，来掩飾它想統治世界和鎮压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几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說明了日美“安全条約”的反动性质。

首先，日美“安全条約”以及根据該条約所建立的軍事基地，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目的服务的。美国想通过基地網包围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其侵略矛头首先是指向中国和苏联的。

几年来的历史事实說明：美国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已經成为美国侵略朝鮮、干涉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侵略我国台湾的据点。例如，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不久，便迅速把駐日美軍調往朝鮮去。从日本軍事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盲目轟炸了朝鮮所有城市和乡村。美国侵略者不仅动員了日本水手帮助它在仁川登陆；而且还从日本輸送很多彈葯去屠杀爱好和平的朝鮮人民，对朝鮮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充分說明日美“安全条約”和軍事基地是属于侵略性质的。

第二，日美“安全条約”和軍事基地并不能給日本带来安全，相反地却威胁着日本民族的和平生存。

美国战争販子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对中苏两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美国本土和它的基地也会遭到大規模毁灭性的火箭和核武器的反击。狡猾的美国战争販子企图避开主要打击，用牺牲他国人民的办法，在其“盟国”的領土上积极准备原子战争。根据日美“安全条約”，美国公开地把原子武器运进日本。这样，一旦发生战争，就会使整个日本处于大規模毁灭性火箭和核武器反击的危险中。对于人口稠密、領土較小、工业集中的日本民族来說，是存在着致命的危险！

第三，旧金山“和約”和日美“安全条約”只是給日本以“独立自主”的幌子，美国基地严重地侵犯和蹂躏了日本的領土和主权。駐日美軍在“安全条約”和“行政协定”的庇护下，随意侵犯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权和生命安全。

駐日美軍根据日美“安全条約”拥有鎮压日本民主运动的权利，担当警察和宪兵的角色，时时刻刻在监視着日本人民的行动，帮助日本反动派維持其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起着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既然基地是美軍鎮压日本人民的据点，对于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自由的运动的深入开展来說，是一种严重的障碍。

其次，日本人民不仅向美国駐軍繳納巨额的所謂“防卫分担費”，而且还遭到了巨大的灾害。美軍建立大量的基地，曾使成千成万的日本农民和渔民遭到破产。1955年美軍所建立的軍事基地面积竟超过了14万町步，侵占了农民的大量耕地④。有些基地則使魚产丰富的海濱变成了“死了的海”，总計有21万多名渔民受到損失，每年魚产量損失6,600多万貫（每貫合3,75公斤）。

再次，几年来，美軍的横行霸道和强姦日本妇女的兽行，严重地侮辱了日本人民的民族尊严，败坏了日本青少年的道德品质。美軍駐地成了伤风败俗的罪恶場所，一个美国随軍牧师透露，仅在日本

---

① 以上内容参看“六法全书”，日文版，第2239——2245頁

② 参考“前卫”，1956年第4期第40頁。

③ 1959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論。

④ “国际問題譯丛”，1956年第10期，第31頁。

三泽美国空軍基地的5千名居民中，就有妓女1,200名①。美軍敗坏日本道德已經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仅到1952年4月，“在日本存在有7万到8万妓女，……美軍在日本制造了20万私生子，許多不幸的母亲被迫淪为娼妓。”②至于美軍的枪杀奸淫，美国軍車横冲直闖，到处伤人的罪行，更是层出不穷。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材料，只在1953年10月到1954年10月的一年中，美軍及其家属侵犯日本人民的罪行，經日本检察厅受理的就达6,465件。这就是說，日本人民几乎每隔两天就要遭受一次美軍枪劫，日本妇女每隔四天就遭到美軍一次强奸暴行，每天平均有四个日本人被美軍的暴行伤害，每天平均有三个日本人因美軍的車禍而受伤或变成殘废。日美“安全条約”使日本人民所遭受的屈辱和迫害是罄竹难书的。因此，从它締結以来，一直遭到日本人民的坚决反对，要求废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約。

第四，美国垄断資本利用日美“安全条約”和“巴特萊法”，禁止日本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陣营各国进行貿易，使日本变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場”，替美国侵略軍服务。由于日本經济依附于美元和美国市場，几年来日本的对外貿易經常发生逆差，例如1958年日美貿易的入超竟达5——6亿美元之多，这对依靠貿易生存的日本經济来說，是一种严重的危害。很明显，由于美国的“禁运”政策，日本不能同中国进行广泛的貿易，日本資本家不得不用較貴的价格和运费，从遥远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輸入原料，致使日本工业品的成本很高，影响其在世界市場上的竞爭能力。但是，岸信介反动政府不仅不想恢复中日貿易，反而破坏中日民間貿易协定，追随美国，敌視中国，致使中日两国人民改善两国关系、恢复两国貿易的愿望至今不能实現。可見，日美“安全条約”和“禁运”政策，是日本經济发展的絆脚石。

第五，美国軍事基地也严重地威胁了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的安全。日美“安全条約”是同所謂“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約”等侵略条約紧密連系在一起的，成为美国侵略集团鎮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据点。

第六，在日美“安全条約”的幌子下，“美帝国主义一貫扶植日本軍国主义复活。日本垄断資本集团，也指望依靠美国，实現其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③

美日反动派早在日美“安全条約”締結以前就进行秘密勾結，在美国侵朝战爭爆发后的两个星期，即于1950年7月8日建立了一支75,000名的“警察后备队”，从其編制、裝备和訓練的性質来看，“本質上是正規的日本陆軍”④。日美“安全条約”签訂以后，美日反动派更加积极重新武装日本，到1952年秋，把“警察后备队”改为“保安队”，人数增加到11万人。美日反动派在1954年3月8日又签訂了一个新的軍事协定（即所謂“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規定日本必須遵照美国的意志和侵略計划，“要履行日本政府依照‘日美安全条約’所承担的軍事义务”，在其本国的經济政治情况許可的条件下，要竭尽全力加紧扩充軍队（第八条）⑤。吉田反动政府根据这个协定，于1954年6月强迫国会通过了所謂“防卫厅組織法”与“自卫队法”，将“保安队”改为“自卫队”，公开宣布日本重新武裝，陆海空三軍总兵力增加到15万人，坦克、飞机、大炮等武装則由美国供給，日本軍队要受美国軍官的监督和控制⑥。此外，日本反动政府拟訂了六年扩軍計划（1955——1960年），規定到1960年使三軍总兵力达到276,000人；另有后备队2万人。（此計划后来稍加修改，但变动不大）

岸信介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它依靠美国来实現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的政策，企图修改宪法、“警官法”和日美‘安全条約’。目前，岸信介政府对于广大日本人民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約”的呼声，非但充耳不聞，相反地却急于通过同美国政府修改条約的談判，来粉飾他的卖国活动。根据岸信介公布的修改后的日美“安全条約”草案，不仅没有絲毫改变原条約的基本性質，而且进一步把日本拖入美国的軍事侵略体系。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最近揭露了新的日美“安全条約”草案內容的实質和日美反动派的阴謀。⑦

---

① 1955年7月29日人民日报。
② 納塔拉爾著：“从广島到万隆”，第98頁
③ 周恩来总理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④ “日本問題文件汇編”，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222頁。
⑤ “国际文献选輯”，第一卷，1954年版，第91頁。
⑥ “国际文献选輯”，第一卷，1654年版第91頁。
⑦ 1959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新的日美"安全条約"草案內容規定：美軍仍然有权在日本国內及其周围部署陆、海、空軍"（草案第六条），这样不仅为美軍的長期占領日本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还要使日本在"加强自卫"、"联合行动"、"反对侵略"的种种幌子下，加紧进行核武装、派兵出国、协同美軍作战，使日本承担更多的"軍事义务"，使日本人民充当美国发动侵略战爭的廉价炮灰。因此，新的日美"安全条約"仍然是复活軍国主义和使日本屈从于美国的卖国条約。

越来越多的事实說明：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的阴謀活动日益猖狂。其具体表現如下：（1）日本軍費支出增加得非常快，从1950年度的200亿日元已經增加到1959年度的1,360亿日元的龐大数字。这样自然推动了日本軍火工业扩大生产。目前，日本不仅大力发展軍火工业、制造軍艦和噴气式战斗机，而且还試制导彈、向装备导彈和核武器方向发展；（2）日本軍队的数目和战斗力也是逐年增加的。目前，日本三軍总兵力已达24万余人，另外还有后备队一万余人，陆海空軍拥有1,391架飞机，远远超过了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武装力量；（3）日本旧軍閥又开始抬头，他們不仅掌握了軍队的作战指揮权，而且还在"日本乡友联盟"、"偕行会"、"水交社"等名义下，組成了二百多个旧軍人团体。他們与日本財閥一唱一合，高叫"修改宪法"、"重新武装"、"复活天皇制"等口号，为岸信介加速复活軍国主义鳴鑼开道；（4）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法令，恢复軍国主义教育和法西斯統治，企图通过"勤务評定"控制教育事业和教职員的政治思想，宣揚以"尊皇"为中心的封建道德，向日本人民灌輸軍国主义思想。总之，日美反动派正在加紧重新武装日本，复活軍国主义。这是日本垄断資本集团一貫坚持实現其潛在的帝国主义野心的明显表現。

自从朝鮮战爭以来，日本經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水平的两倍半，因而使日本垄断資本集团已經具备了复活帝国主义的經济基础。最近数年来日本垄断資本进行盲目生产和竞爭的結果，扩大了生产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引起了1957年开始的生产过剩危机。这种矛盾就是日本垄断資本集团重又采取对外扩張政策的原因，傾其全力夺取海外市場。但是在亚洲的新形势下，日本垄断資本集团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因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屈从美国，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复活軍国主义、重霸远东，实現其潛在的帝国主义野心。

至于美日反动派把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的阴謀活动，說成是为了"安全"和"自卫"，純系一种騙局。因为在美帝国主义的原子战爭政策和侵略政策下，并按照美国侵略者意图所建立起来的日本軍队，是同維护日本民族独立、和平发展的任务毫无共同之点；而是驅使日本人民为美国侵略者充当战爭炮灰、为日本垄断資本集团利益服务的。岸信介政府不是废除这个丧权辱国的日美"安全条約"，而是修改这个条約，使日本更加屈从于美国，这种活动本身是具有反民族反人民的卖国活动的性質。

上述各点，充分說明了日美"安全条約"的奴役日本人民和反对亚洲人民的实質。

二　日本人民爭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的斗爭

日本人民阻止修改和爭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的斗爭，是日本人民長期以来反对日美"安全条約"、反对复活軍国主义的斗爭的継續。自从日美"安全条約"签訂的时候起，日本人民为了挽救民族的厄运、为了摆脫被奴役的悲慘境遇，曾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斗爭。因为广大的日本人民清楚地記得：日本軍国主义者所发动过的侵略战爭，曾給日本人民带来了无数的孤儿、寡妇和伤兵，原子彈給日本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創痛。日本人民也从切身的体驗中認識到：只要美軍継續留在日本，只要日本領土上还設有美国的軍事基地，他們就不可能得到眞正的民族独立，而且还有被卷入原子战爭、遭到民族毁灭的危险。很明显，从整个远东局势来看，只要美帝国主义不发动侵略战爭，只要日本軍国主义不能再起，其他国家是不会或很难于发动大规模的战爭。正如"人民日报"社論中指出："而日本一旦变成了美国的原子战爭基地，日本軍国主义势力一旦被扶植起来，那就必然会加剧远东的战爭危险。这不仅会更加严重地威胁日本的独立和安全，并且会严重地威胁着远东和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和安全。"①如果容許修改日美"安全条約"的阴謀得逞，不仅在日本国內将复活軍国主义、民主和人民的生活将面临危机，而且一旦战爭爆发，将使日本变成原子战爭的一片焦土。因此，日本人民

---

① 1959年3月3日人民日报社論。

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的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保卫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也是争取中立与維护宪法的斗争。

几年来，日美"安全条約"侵犯日本領土主权和使日本人民遭受屈辱的事实，教育了日本人民，激怒了抱有爱国心的各阶层的人們。他們并不相信"关于苏联、中国要侵略日本"的毫无根据的虚伪宣傳；而他們亲眼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姊妹遭到姦污、美軍逞凶肆虐、农民土地的被剝夺和漁民丧失捕魚权利。因此，战后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約"和軍国主义复活的浪潮，在日本全国各地区內一浪接着一浪，不断向前发展。

日本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中，已經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組織、創造了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他們曾手拉手地阻止政府测量土地的工作，用鮮血和生命保卫了自己的土地，击退了美軍扩充基地的阴謀。他們也曾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約"、反对美国軍事基地和反对复活軍国主义的口号下，組織規模巨大的示威游行。特別是，禁止原子彈和氢彈的签名运动获得了輝煌的成績，去年签名要求禁止核武器的人数为3,400万人，現在已增加到3,500万人，約占日本总人口的40%。这些艰巨的斗争表明，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独立与民主的意志是不可摧毁的。他們日益清楚地認識到，这种斗争就是維护他們切身利益的斗争。

近几年来，随着日本人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本民主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長，工人阶級已成为斗争中的核心和主要力量。現在日本工人阶級已經拥有600万有組織的工人参加的工会运动。在争取和平与独立的斗争中，日本共产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不仅站在斗争的前列，而且积极团結国內民主力量，把工人运动引向争取独立与反对軍国主义复活的斗争。日本民主力量的发展与斗争，已經达到了巨大的規模，甚至于进一步影响了日本国会的选举。近几年来，由于共产党、社会党等民主力量在国会中获得了1/3以上的議席，使日本反动派在国会中通过修改宪法草案，公然复活軍国主义的企图未能得逞。例如1954年11月吉田反动政府公布了一个宪法修改草案，企图修改宪法中規定的放弃战争的那一条（第9条），还想恢复天皇制度，使天皇有宣战、媾和等权力①。可是，由于日本人民的反对、以及共产党、社会党和劳农党在国会中获得了超过1/3的票数，使日本反动派修改宪法的阴謀未能实現。

几年来，日本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获得了多次的胜利。他們不仅在国会中阻止日本反动派修改宪法，而且在争取同中苏两国恢复邦交的过程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象吉田內閣的倒台和日苏两国恢复邦交，一方面固然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发展的結果，但是，日本人民的斗争对此也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从去年10月以来，日本人民斗争的新高涨，給予岸信介政府以严重的打击。去年，在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日本人民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实行"警官法"，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約"的运动。这次运动規模之大、参加的阶层之广和声势之壮，在战后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广大的劳动人民、知識分子和一部分中小資产阶級已經被卷入了这一运动。在1958年11月5日，有550多万日本工人，在日本全国各地举行了空前規模的大示威，反对岸信介政府修改"警官法"和复活軍国主义。参加这次斗爭的还有数目众多的学生和各界知識分子。結果，使岸信介政府修改"警官法"重建警察国家的阴謀遭到破产，并引起自由民主党內部派系斗争的尖銳化，日本政局一度陷于不稳。由此可見，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对于保卫日本民族利益和远东和平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但是，岸信介政府并未因为这种不利局面而改变它复活軍国主义的計划。相反，它急于同美国結成軍事同盟，实現其帝国主义野心。因此，今春以来，日本人民又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阻止修改和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在这次斗争中最突出的現象是：（1）属于日本工会总評議会和中立工会的400多万日本工人，在今年春季斗争中，不仅要求提高工資和保障工人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要求恢复中日邦交和打倒岸信介政府等政治口号；（2）日本社会党、共产党、日本工会总評議会等140多个团体于今年3月中旬决定采取联合斗争，成立了"阻止修改和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国民会議"②，并于4月15日举行了"为废除安全条約和阻止修改安全条約全体人民統一行动日"③。在日本全国各地同时举行县民大会、地区大会和工作場

① 1955年12月5日大公报。
② 195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③ 1959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論。

所大会；东京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对日本首相岸信介举行集体請愿；日本工会总評議会的会員們还在市內举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3）在今年4月末开始的地方选举与日本參議院的选举中，民主力量所得的票数增加了。特別是日本參議院选举結果表明，日本民主力量获得了超过1/3的議席，使得反动派企图修改宪法的阴謀遭到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上述这些事实說明，日本争取和平、独立、民主的力量的团結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特別是日本社会党同日本共产党采取联合行动，这对斗爭的发展，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日本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战爭計划得到成功，不但对于日本的独立而且对于远东和亚洲的和平和安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們相信，尽管日本人民的斗爭将更加艰巨，但随着日本广大人民觉悟的提高和民主力量团結的加强，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 × ×

日本人民的斗爭并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以及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是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約"、反对复活軍国主义的英勇斗爭。今年3月3日，在中日两国共产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的这一正义的和爱国的要求。""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不能坐視日本軍国主义的复活，也不能容忍岸信介政府継續采取敌視中国的政策。"①現在，在亚洲，同战爭和軍国主义相对立的和平民主力量已經空前壯大了。中苏两国的伟大团結以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些条件就是日本軍国主义者侵略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如果岸信介执迷不悟，将会遭到彻底的失敗。

1959年6月13日

① 周恩来总理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越南史学簡訊

按照越南劳动党中央1953年12月2日的决議，于同年年底在越北战区成立了历史、地理与文学研究委員会(簡称为文史地研究委員会)。該会成立到1958年底的整整五个年头里，作了不少的工作，該会出版的三十一部著作中，历史书籍就占有十五部，其中有明峥的"越南史略（初稿）"（中譯本已出版），陈輝燎的"抗法八十年史"（中譯本上册即将出版），此外还出版了十二册"越南近代革命史參考資料"。除此还出版了"文史地"月刊，共四十八期。該刊結合越南当前的实际，发表了不少研究論文，如越南历史上的土地問題，越南資产阶級的形成，越南民族的形成，越南历史上是否經历过奴隶占有制等問題。該会还将"越史通鑑綱目"譯成越南文，并已出版。

和平恢复后，文史地研究委員会在国际上的交往也日益頻繁，和联苏、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陣营国家、越南毗邻国家如柬埔寨、老撾及东南亚国家的有关部門与个人取得了联系。

越南民主共和国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机构除文史地研究委員会外，还有綜合大学、教育部的教科书編輯委員会、历史博物館、革命史博物館等单位。

在越南社会主义建設飞跃发展的今天，形势对史学工作的要求更高了，因此，在今年年初撤銷了文史地研究委員会机构，在原有基础上，另行成立了越南史学院，直接受国家科学委員会領导。今年3月，該院出版了第一期"历史研究"月刊，主任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員会副委員長、著名历史学家陈輝燎。該刊今后将刊載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方面的文章。

对外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对邻邦柬埔寨、老撾历史的研究工作，将主要由河內綜合大学負責，越南史学院大力协助。

1960年是河內建都九百五十周年，为了紀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越南史学院已成立了临时編輯委員会，組織史学院內外的史学工作者参加編撰"首都河內史"。

目前，越南各地各单位对編写地方志、专业史和部队史的要求日益迫切，史学院将派出工作人員协助各地方、单位进行編写工作。（范宏貴編譯自越南"文史地"第48期，"历史研究"1959年第1、2、3期。）

論德國軍國主义在兩次世界大战中失敗的原因

〔苏〕 格·阿·捷波林
古·費·查斯塔温科
波·謝·帖尓普霍夫斯基

二十世紀上半期，德国帝国主义为了重分世界和統治世界，曾經兩次充当世界大战的禍首，但結果都失敗了。德国人民被兩次拖入民族災难的深淵。現在，德国东部的劳动人民，获得了自由决定自身命运的机会，从历史經驗中作出了应有的結論。他們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的領导下永远根除了資本的統治，永远消灭了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但是西德，仍然是危害和平事业的、軍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策源地。

西德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的史学家政論家，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正在設法証明，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敗都出于偶然。

反动的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特别热心地力图証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敗的偶然性。他們当中一些人（主要是西德的）不顧事实，把战爭的策划、战爭的領导和战敗的責任都推在希特勒个人的身上，另一些人（主要是美国的），認为这个"致命的"偶然性乃是美国站到德国敌人的一边，而这一点，据他們看来，是已故的罗斯福总統的罪过。最后还有不少这样的反动的史学家，他們同时提出一些偶然因素，他們特别抱怨俄国的气候，仿佛它阻碍了侵略軍的行动，而帮助了紅軍。

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敗是偶然还是合乎規律的这一問題，已經成为尖銳的思想斗爭的对象。国际进步势力正确地証明德国失敗是理所当然，并对德国帝国主义新的軍事冒險者发出了警告。但是波恩的反动分子却相反地断言：德国利用新的情势的有利凑合，在第三次战爭中不会失敗。根据这个論点，他們正在展开狂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傳。

科学地分析兩次世界大战的結局，可以令人十分信服地証明，德国帝国主义的兩次失敗，不是由一些偶然的情况决定的，而是由各种客观的因素决定的。这些客观因素包括：經济資源和人力后备；社会的社会經济制度、国家制度和它們对力量对比的影响；后方的坚固程度和人民群众对战爭的态度；士气和民气；师团的数量和質量；軍队的裝备；指揮人員的組織能力。

× × ×

在兩次大战的准备时期里，德国軍国主义的理論家都曾不断地吹噓着："战爭的幸运"是跟随着德国的。他們援引在帝国主义阶段以前的普奥战爭和普法战爭作为例証。普魯士的胜利曾經使許多零散的日耳曼小国統一起来，建成为一个德意志帝国，即所謂"延長了的普魯士"，这些胜利也就成了在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打上烙印的"軍国主义自大狂"的原因之一。德国帝国主义的理論家們，百般吹噓德国武力的胜利，而不去揭示这些胜利的眞正原因。他們比較喜欢談論日耳曼种族的某些历史上的伟大和德国士兵的战无不胜。

关于普魯士在上述战爭中获胜的原因引起人們的兴趣。当时普魯士在师团的数量和質量以及武器方面，确曾占有絕对的优势。但是普魯士之所以能战胜德国，并不单是由于它在軍事技术和軍事組織上的优越。

当时的欧洲正是处在封建割据被消灭和現代国家基本形成的过程中，这是确立比封建制更先进的、新的、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組成部分之一。大家知道，德意志民族的再統一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同一进程迟緩些，它不是通过革命的办法来完成的，德意志民族的再統一的任务是由普魯士用軍事办法来完成的。当时普魯士不但是德国的、而且是

全欧洲的最富于掠夺性和軍事性的国家。由于旣定的历史条件，它終于担負起了統一德意志的进步事业，而从前的德国原是由許多封建小国所割据，那种局面阻碍国家向着比封建制較先进的社会制度即資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普魯士战胜維护封建割据的奥法两国的主要原因。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德意志帝国資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德国发展为极端軍国主义的侵略的国家，业已巩固的、拥有强大的軍事力量的德意志帝国，便极力向外扩張。但是，当时世界已被几个老牌的資本主义列强分割完毕。德国帝国主义者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和占有自己的“生存空間”，提出了夺取地盘、建立自己世界統治的綱領。

德国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目标”是：

1.占領俄国大片土地（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烏克兰）作为德国农民的移居地。

2.兼并比利时。

3.兼并法国鉄矿区：郎威和布利埃，把德法边界从柏尔福、托尔、凡尔登和索姆河往西推移。

4.消灭英国的海上霸权，从英国手里取得新的殖民地。

5.清除德占区的居民，因为德国需要的只是不帶居民的土地①。

德国在世界市場上竞爭的加强、德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增長，是引起协約国（英、法、俄和后来的美国）反德联盟产生和巩固的客观基础，但是德国当权集团却没有认清反德联盟的这个客观基础，錯誤地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中立上面。

德国帝国主义者在对美国的态度上犯了特别大的政治錯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同强大的德国垄断組織在利益上有最尖銳矛盾的美国帝国主义統治集团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协約国。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德国的經济发展得非常迅速。

“經济上和政治上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义底絕对規律。”②这个規律作用的結果导致了德国在其它資本主义国家中跳跃式的上昇，这就是世界大战成熟的主要因素。但是，向前发展着的王朝德国却没有那种能以保証它在長期战爭中获胜的物質可能性。这一点，下面的資料可为証明：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集团在1913年的基本經济指标③

（单位：百万吨）

	英法俄	美国	德国
鉄产量	19.7	31.0	19.3
鋼产量	16.5	31.0	18.3
煤产量	356.1	508.9	190.1外加（褐炭)87.2

上表說明，比起英法俄，德国經济上并不占优势。此外，德帝国主义没有估計到自己的敌人拥有大量的、在总的实力对比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殖民地后备。利用这种后备，英法統治集团曾大大地提高自己軍事和經济的潛力。如果再算上美国的生产規模，协約国对德国的优势就更无可爭辯了。

德国的敌人拥有强大的动力和原料資源，能够以远超过德国的規模扩大軍事生产，而德国却要依賴国外进口的鉄矿石和石油。德国的农业不能保証居民以充足的粮食。所有这些，都說明德国的軍事經济潛力是有限的和脆弱的。

协約国还拥有巨大的、大大超过德国和德国盟国的人力后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人口④

（据1913年材料，不包括殖民地。单位：百万人）

德国及共盟国		德国的敌人	
德国	67	英国	41.3
奥匈	52	法国	40
土耳其	20	俄国	159.2
保加利亚	6	美国	96.5
		意大利	48

在战爭过程中，美国、英国和法国能够动員的，不仅有自己和自己殖民地的資源，而且有許多附属国和中立国的資源，因此他們的力量不断增加，而德国及其盟国的力量则不断衰竭。

德国陆軍的装备和訓練比它的敌国强一些，但軍队的总数并不比它的敌国多。1914年8月，

① H.克拉斯：“通向激流”，莱比錫1932年版，第320—323頁。

②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4頁。

③ “1848—1935年世界經济危机”，第一卷，莫斯科1937年版，第494、498、502、506頁。

④ 同上书，第492、502、506頁；“苏維埃政权40年成就数字”，莫斯科1957年版，第7頁。

德国有87.5个步兵师和11个騎兵师，总人数2,147,000，动員完成后，德軍共3,822,000人。奥匈帝国在战争开始时有49.5个步兵师和11个騎兵师，总数1,421,200人，动員后，武装力量的人数达到2,500,000人①。

英国的常备軍（包括印度軍队）共有411,400人。不列顚的海軍当时占世界第一位。法国拥有大量基本上訓練良好的軍队，战争开始时，有92个步兵师和10个騎兵师，总数为2,689,000人，动員后共为3,781,000人②。

俄国开战前有122个步兵师和36.5个騎兵师，总数2,500,000人，动員后共有550万人③。

从武裝力量的人数上看，光是德国在欧洲的敌国就大約比德国多半倍，即1,250万对820万④。

德国帝国主义者也忽視了被占領区人民抵抗侵略者的这个重要因素。这种抵抗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德国侵略軍占領的俄国領土上广泛地展开了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使它具有了新的性质。

因此，协約国在物質資源上超过了德国及其盟国。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国家同样的社会經济制度的情况下（双方都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資本主义統治下），物質資源和实力的优势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国不可能用其他方法（例如軍事）来抵补这种优势。战争史的經驗教导我們，在交战国双方同样的社会經济制度情况下，軍事因素只能在一定的、有限的范围內抵銷对方物質和經济上的优势。軍事因素（武器的数量和質量、軍队的战斗力、指揮人員的才能等）虽有相当的独立性，但它归根結底决定于和依賴于物質因素。德国統治集团忽略了軍事因素对物質因素的这种依賴性，过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武裝力量。

德国帝国主义者过高地估計軍事因素，表現在他們的"闪电战"战略和根据这个战略制定的作战計划上。

他們希望凭借实現总参謀部在1914年以前就制定好了的"薛利芬計划"获取胜利。"薛利芬計划"規定德軍用全力袭击比利时和法国，并在俄国援助其盟国之前取得胜利。德国帝国主义者計划用四十天左右的时間击潰法国，然后把主力調到东方，并在短期內击敗俄国。

德国总参謀部和将軍們的这一切計划和打算，都是冒险主义的，都是任务与实际可能性不相符合的。

1914年8月4日，"薛利芬計划"付諸实施。协約国軍队在边境的战斗中敗退了。德国的軍事首脑們过高地估計了这次胜利，他們以为剩下的只是歼灭敌人了。

但是，法英軍队只不过是为了保存战斗力的退却。法国統帅部識破了德国的作战計划，迅速地完成了軍队的重新部署，准备从側翼来打击迂回进攻巴黎的德軍。这时，德軍的境况由于"薛利芬計划"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俄軍在战争开始后头几个星期內无所动作計划的完蛋而根本逆轉。这里，暴露出德国統治集团对俄国經济和軍事力量的估計不足。

俄軍履行自己盟国的义务，在約定的时期——战争开始后两星期——向东普魯士和加里西亚大举进攻。德国在东方的掩护部队挡不住俄軍前进。德国指揮部困于局势，急忙从包抄巴黎的軍队中抽出两个軍团和一个騎兵师。德軍展开反击后击潰了薩姆索諾夫和倫宁康普夫的軍队，把他們逐出东普魯士，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东綫的局势。几乎就在同时，俄軍在加里西亚大敗奥匈軍队。因此，俄軍及时建立第二战綫打破了德国統帅部的战略計划。德国陷入了两綫夹击的状况，失去了胜利的可能性。

由于法軍的反攻，1914年9月5—12日馬恩河之战埋葬了"闪电战"計划，德軍轉入陣地战。

德国的統治集团和将軍們没有从"薛利芬計划"的破产中得出应有的結論。德国統帅部认为，失敗是出于偶然，并着手制定新的計划。

1915年，德国指揮部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东綫，在那里展开广泛进攻。但未能实現自己的战略計划——迫使俄国退出战争，从而摆脫两綫作战的境况。

德国帝国主义者仍然没有从战争經驗中得出应有的結論。1916年，德国总参謀部进行了新的"击潰"西綫敌人的尝試。由于东方的牽制，德国在西綫只拿得出120个师来对抗英法150个师。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总参謀部竟然計划于十四天內打败敌人！

---

① A.M.賽昂奇科夫斯基："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莫斯科1931年版，第21頁。

② 同上书，第21—24頁。

③ Г.Д.綏加林："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中的战时經济"，莫斯科1956年版，第53頁。

④ "世界大战数字集"，莫斯科1954年版，第13頁。

1916年底，德国已經无力使敌人遭到决定性失敗，于是，企图用帝国主义的和約来巩固自己占据了的土地。德国統治集团依然是各种冒險計划的俘虏，他們以为情况正在逐漸好轉的协約国会同意标志着德国胜利的那种和平条件。

德国統治集团已經面临着急剧增長的經济和政治困难，国內沙文主义浪潮低落了，群众反战情緒加强了。

在战争的过程中德国的处境日益恶化。1917年4月，美国加入了反对德奥集团的战争。德国最高統帅部对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人民群众的斗爭对局势和事件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各国人民日益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战爭和产生帝国主义战爭的帝国主义制度。各国人民的这一斗爭促成了1917年10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苏維埃国家刚一誕生，就采取步驟来制止帝国主义屠杀。其中第一个行动，是第二次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苏維埃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刻开始进行正义民主的和平談判"①。

苏維埃政府的建議遭到交战国双方帝国主义者的敌視。美英法当权集团断然拒絕談判，同时千方百計地想使苏維埃国家卷入同德国的軍事冲突，以便用德国帝国主义者的手来扼杀苏維埃共和国。

德国帝国主义夢想侵占俄国的广大領土，根据战略的考虑，同意同苏俄談判。但是，德国政府旋即利用托洛茨基拒絕根据德国提出的条款签訂和約，而对我国发动进攻。苏維埃人民奋起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德国帝国主义者領略了紅軍的打击力量，始被迫签訂和約。

在德軍占領地区开始出現强大的游击运动，德軍不能不同人民解放运动进行对自己毫无前途的斗爭。德国統帅部为了在东方战場上及早获胜，不能在西綫投入必要的兵力，因此，德国的軍事崩潰逼近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德軍也起了革命的影响，革命情緒深深地滲入到各个部队。

德国統帅部不顧有大量軍队被用来侵占苏俄領土，决定于1918春在西綫发起决定性的攻势。但在这时候，协約国在武裝力量上的优势越来越大。大批美軍开始抵达前綫。德国統帅部打算在美軍大量到达前贏得战爭，这完全是建立在沙滩上面的計划。

协約国除了有大量的美国生力軍之外，在飞机、特别是坦克等武器方面，也占着巨大的优势。

德軍战斗力由于軍官的减少大受損害。有經驗的軍官已伤亡了80—90%，軍队中甚至連稍微訓練过的軍官也是缺乏的②。

1917—1918年，德国后方发生了粮荒。到1917年6月，每人每日口粮的热量几降低到1100卡，約为正常需要的1/3。工业和运輸业日趋崩潰。对战爭的不滿情緒，普及于居民和士兵之中。

1918年7月18日，协約国軍队开始决定性的反攻。德軍被迫后退。这次进攻的胜利使德国瀕于軍事崩潰。但是失去理智的德国統帅部仍不愿承認事实。魯登道夫在1918年8月14日的斯巴御前会議上說："我們一定能够留在法国領土上，所以一定能最后迫使敌人接受我們的意旨。"③这种观点竟得到御前会議的贊同。

但是，前綫事件的发展，与总参謀部頑固人物的希望相反，急轉直下，德軍失去了战斗力。

德国的战敗已成为事实，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

但是，德国統治集团企图蒙蔽德国人民，不让他們知道德国在世界大战中失敗的原因，甚至还不要他們知道德国失敗的事实。

德国反动派匆忙地提出革命从"背后打击"了德軍，致使后者放弃即将取得的胜利的鬼話。可是，十一月革命不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敗的原因，恰恰相反，它是加速了国內事件发展的德国失敗的結果。反动派之所以需要所謂"背后打击"的謊話，为的是用来辯护德国統治集团的冒險政策，为的是在思想上毒害人民，准备新的世界大战。

德国統治集团在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里，支持所謂"背后打击"的讕言。"德国反动阶級，特别是希特勒法西斯，利用背后打击的鬼話欺騙德国人民，不让他們知道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敗的眞正原因，以求比較容易地把人民卷入

---

①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2頁。

② H.耷列夫："从薛利芬到兴登堡"，莫斯科1956年版，第280頁。

③ 馮·庫克、Г.德布留克合著："1918年德国进攻战的失敗"，莫斯科1935年版，第263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灾难。”①

× × ×

法西斯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和加深的結果。是这个体系的产物，并且首先从它的内部爆发了。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爭取重分世界、建立世界統治的帝国主义战爭。

但是，在事件后来的发展中，由于人民群众的斗爭，战斗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变成了反法西斯的解放战爭。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变化决定于苏联的参战，苏联参战是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解放斗爭中的决定性因素。反軸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义性，是战敗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最反动国家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各大国实力和資源对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証德国帝国主义实現自己树立世界統治的計划呢？且看下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个資本主义集团主要的經济指标②

指　标	德日意	英法美
本国人口(百万人)	195.9	220.9
殖民地和附属国人口（百万人）	87.0	586.0
电力年产量(十亿度)	116.5	176.4
鉄年产量（百万吨）	21.8	48.4
鋼年产量（百万吨）	31.5	69.6
石油及人造燃料年产量（百万吨）	3.5	171.0
谷物年产量(百万吨)	53.1	119.7

甚至单就欧洲，不包括殖民地和美国在內，英法在人力和物質資源方面也不次于希特勒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德的主要經济指标③

指　标	英　法	德
人　口（百万人）	89.5	79.4
电力年产量(十亿度)	48.8	66.0
鉄年产量（百万吨）	16.0	17.5
鋼年产量（百万吨）	21.7	23.0
煤年产量（百万吨）	287	200④

当然，法西斯国家的領导人也熟知資源对比的材料。但是，他們想首先以軍事因素来抵銷敌人的优势。这里又表現出德国帝国主义者对这种暫时的偶然的优势的瘋狂信心。起初，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用較好的技术武装了軍队，可是它的敌人依靠較强大的軍事經济潛力，經过一段时間以后，就在这方面赶过了希特勒德国。

現在我們列举材料来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两个帝国主义集团武装力量的对比⑤。

指　标	德日意	英法美
陆　軍（千人）	5,600	1,838
飞机	12,355	12,200
巨型战艦	286	610⑥
潛水艇	225	229⑦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英法及其盟国軍队的数量有了迅速的增加。德国軍队人数虽然也增多了，但它在这方面很快就失去了优势。希特勒德国在1939年9月10日有109个师，在1940年5月10日有157个师⑧。意大利只有59个两团編制的师，其中20个师人員和武器配备仅是滿額的70%，有的甚至是90--50%。德国在欧洲的其它盟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而德国的敌人在积极作战以前，波兰有30个步兵师、11个騎兵旅，法国有112个师，英国有10个师，比利时有22个师，荷兰有9个师。殖民地列强在殖民地还拥有相当大的力量，还拥有由当地人編成的师团。

但是，能最后决定战爭結局的那些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是立即表現出来的。德国起初利用暫时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希特勒党徒借助于法国資本家，暫时瓦解了法国的后方，击敗了法国。但是軍事的失敗并没有摧毁法国人民反抗的意志。法国的抵抗力量日益成熟和壯大起来。希特勒德国的首脑們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情况。

进攻苏联是德国帝国主义者最冒险的步驟，希特勒分子不考虑也不愿考虑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过时資本主义决定性的优越性。

共产党領导的苏联人民用伟大卫国战爭来回答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德国碰到苏联人民的强大力

① L. 斯特恩：“伟大十月社会主义对德国及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柏林1958年版，第178頁。
②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軍事簡史，莫斯科1958年版，第52頁。
③ 同上书，第53頁。
④ 不包括褐煤。
⑤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2頁。
⑥ 包括126艘超齡的美国驅逐艦。
⑦ 包括65艘超齡的美国潛水艇。
⑧ Б.米列尔—吉列布兰德：“1933—1945年的德国陆軍”，第2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11、54—55頁。

量。苏联人民受到蓬勃的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正义解放目标的鼓舞，苏联人民是摧毁希特勒德国战争机器的决定力量。

共产党的領导，苏联人民道义和政治上的統一，苏联各民族的友誼和苏維埃爱国主义，是我国威力在战时不断增長的決定因素。苏維埃爱国主义是苏联人民力量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强大源泉。苏联各族人民优良的民族傳統和他們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对国际主义思想的忠誠，在苏維埃爱国主义中得到完滿的結合。

1940－1941年，苏联拥有提供必要物資反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經济基础。1940年，苏联生产鉄1,490万吨、鋼1,830万吨、电力483亿度、煤16,590万吨①。但法西斯德国經济和軍事的資源在数量上超过了苏联的生产能力。德国加上德国占領的国家，在进攻苏联之前，同苏联相比，煤約为2.5倍，鋼約为1.5倍，鉄为1.3倍②。但軍事和經济的潛力并不只是簡单的把有关經济的数字和武装数量相加来計算的。

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及其有計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使苏联能够以較小的經济能力生产出大量的品質优良的武器和装备。資本主义經济制度及其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竞爭的規律，使德国难以把已有的經济能力充分发揮于战爭目的。

苏联虽然暫时失去了一些重要的經济地区和煤鉄鋼的产量大减，但苏联的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員在共产党的領导下，保証了較德国規模更大的武器生产，特别是从1943年以后。在战爭的后三年中，苏联最重要武器的平均年产量是：坦克和自动炮3万多輛、飞机4万架、大炮12万門、迫击炮10万門、机枪45万挺。同时，德国軍事生产的平均年产量为：坦克和自动炮18,800輛、飞机26,000架、大炮55,300門，迫击炮21,200門，机枪276,000挺。这样，苏联尽管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工业地区，仍然在最重要武装的生产水平上赶上了、而且超过了法西斯德国。这表明了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具有的巨大的优越性。

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进攻是突然的、背信弃义的，因而使德国軍队在战爭的头几个月得到暫时的胜利。但是，即使在当时，“闪电战”計划（巴尔巴罗斯計划）的軟弱性和冒险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苏联人民和苏联軍队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异常困难的日子里并没有垂头丧气，并没有失去战胜敌人的信心。苏联軍队打破了“闪电战”計划。德国法西斯軍队在莫斯科城下的失败，使这个計划彻底破产。

“巴尔巴罗斯”計划的失敗迫使德国指揮部在1942年夏天提出一个新的、据希特勒的将軍看来，应該考慮經济意义的計划。新計划的根据是一个設定：希特勒分子占領苏联南部最重要的經济地区可以大大地削弱苏联，加强德国并决定战爭的結局。从这一点出发，德国法西斯軍队对苏德战綫的南翼发动了进攻，引起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寇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潰敗根本轉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人类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看到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曙光。

这以后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場上轉入进攻的几次尝試（1943年7月在庫尔斯克突出地带，1944年12月在亚尔丁，1945年1月在巴拉敦湖畔）以及1945年4－5月在柏林毫无意义的抵抗，都带有冒险的性質。德国軍队的这一切战斗已經不能根本改变战綫的局势。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迅速起着有利于苏联和反法西斯联盟其它国家的变化。德国工业生产不断减縮，德国軍队迅速瓦解，德国重新陷于两綫夹击的状况。

德国帝国主义者在策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认为有可能通过各个击破敌人的办法实現建立自己世界統治的計划。这种打算化为泡影了。

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是现代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正义战爭中联合了起来。这种联合是两个資本主义国家集团間帝国主义矛盾和人民群众坚决要求所引起的、合乎規律的結果。反法西斯同盟的产生，不是个别国家領袖的个人意志，而是由各种客观因素造成的。苏联对外政策估計到并利用了这些因素。

美国和英国的反动集团在战爭年代里拖延开辟第二战場，同敌人秘密談判，一直阻挠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他們的政策削弱了同盟并拖長了战爭。但是，强大的反法西斯同盟經受了战爭的一切考驗，一直存在到战爭的結束阶段。法西斯指靠同盟終于經不住考驗的想法落空了。反希特勒同盟的联合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德国，苏联在这个同盟中起了决定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在各个被占領国家里广泛开展的抵抗运动增加了反希特勒德国的力量。德国法西斯也和他們前輩的王朝德国一样，忽略了

---

① “苏联国民經济”，統計材料集，莫斯科195 年版，第55頁。

②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847頁。

这个异常重要的因素。

苏联人民在德国法西斯占領的地区无情地反抗侵略者。强大的游击运动在希特勒的后方如火如荼，它明显地表現出伟大卫国战爭的全民性。人民的复仇者不但使希特勒軍队蒙受严重損失，而且牽掣了敌人的重大兵力。游击队得到人民的积极支持。

紅軍和游击队的行动，苏联人民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成为鼓舞法西斯占領下其它国家（捷克、波兰、法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爱国志士的榜样。这些国家差不多都建立了为自由、独立而頑强斗爭的人民解放部队。

不管是希特勒党徒的残暴恐怖行为，不管是他們的蠱惑宣傳，也不管是为德国法西斯效力的"第五縱队"和卖国賊的活动，都麻痹不了被奴役的人民为自由、独立而斗爭的意志。

德国在准备为建立世界統治而战的时候，曾首倡建立侵略性的三国"反共协定"，这个协定在1940年变成了三国同盟条約。后来加入的有資产阶級的匈牙利、罗馬尼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法西斯同盟是在这些国家侵略意图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在战爭的过程中，在反希特勒同盟及人民群众反法西斯运动的打击下，这个同盟瓦解了。1943年夏天意大利人民推翻了法西斯制度，加强了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領者的斗爭。在德国本部，德国人民的先进阶层在共产党人領导下，进行了頑强的反法西斯和战爭的斗爭。在太平洋，伟大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摧毁了帝国主义日本的力量。日本帝国主义者想征服中国不过是徒費心思。在战爭的結束的阶段，德国原来的許多盟国也都起来反对德国。結果，孤另另的納粹德国迅即被联合国的武装力量粉碎。在这里，苏联武装力量起了决定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訓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訓都証明，能够保証在平时和在战場上取得胜利的，不是偶然的因素，而是对客观規律性的認識和全盘考慮。依靠偶然性所能取得的，只不过是远非全部胜利的暫时成就而已。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曾取得一些重大的暫时性成就和暫时的胜利，但是两次都遭到了最慘重的軍事和政治的毁灭。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沒有触动德国本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德国全境，并留下長期消失不掉的痕迹。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訓是慘痛的，也是大有教益的。

但是西德复仇主义分子和軍国主义分子却不愿意接受历史的教訓，他們仍然站在德国帝国主义者固有的冒险主义立場，沒有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任何东西。如果估計到现在世界舞台上的状况，就应該承認，从政策的狂妄性来說，西德的帝国主义分子显然是想超过自己的前輩。但是世界力量的配置已經越来越不利于侵略者了。目前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加入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殖民体系的瓦解使帝国主义失去了曾經是資本主义强国在两次大战中重要力量源泉的后方。各国人民維护和平的强大运动业已出現。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已經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变化。

由于苏联在伟大卫国战爭中的胜利，由于人民民主制度在一系列国家中的胜利，社会主义已經成为世界体系。現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面积已占全世界的26%。这片土地上居住着占全世界人口35%左右的居民。社会主义陣营已占有全世界工业产量的1/3以上。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粮食几乎占全世界的一半，棉花占43%。赫魯曉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世界形势已經根本改变了。我国已經不再有資本主义包围了。現在有两个世界社会体系：过时的資本主义和充滿蒸蒸日上的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同情社会主义。……現在世界实际力量的对比是这样的：我們能够击敗任何敌人的任何侵犯。

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在我国恢复資本主义，能够摧毁社会主义陣营。資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經沒有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勝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勝利。**"①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可救药的冒险分子才会幻想試行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和复辟資本主义。但是，世界人民必須警惕，不准帝国主义发动新的冒险。

估計到現有的客观条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指出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完全胜利之前，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世界大战的現实可能性。从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来看，历史教訓特别值得借鑑。誰也不应当忘却这些教訓。

（蔡子宇摘譯自苏联"历史問題"1959年第5期）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頁。



第三次國內革命战爭时期 中國共产党党报和主要进步报刊簡介

文 琪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都极其剧烈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和革命的报刊以及各种中間派的报刊、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报刊各自鮮明地站在一定的阶級立場上参加了这个斗爭。党的报刊在这个时期和一切反动宣傳展开了剧烈的斗爭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为“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訊社写的新聞和評論成为斗爭中极重要的武器。

本文試就历史发展为綫索，将这个时期解放区的和国民党統治区的报刊重点作一介紹，以供搜集資料的参考。

一

“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出版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了2,130期。1947年3月，当国民党反动派不顧一切进攻延安，“解放日报”在我軍3月19日自动撤出延安之后，曾迁至陝北瓦窰堡附近継續出版了几期八开两版的小張，由于战爭的极大机动性和我党中央的轉移，終于在3月27日停刊。

在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这个期間，“解放日报”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內战阴謀，使全国人民認清了只有战斗才有活路这一眞理；当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一切协定、决議，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之后，“解放日报”科学地多方面地向全国人民說明了蔣軍必敗的战爭前途，从而帮助党有力地动員了全国人民和党在一起信心百倍地去爭取战爭的胜利。

抗日战爭胜利后，中国的阶級关系立即发生了新的变化。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时期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軍事实力，等待人民力量一旦打敗日本帝国主义他們坐收抗战胜利果实，然后举行反共战爭，消灭共产党，以維持和巩固其法西斯統治。

我党对于国民党的內战阴謀是早已洞悉并在思想上、組織上作了充分准备的。但是經历八年慘酷战爭的全国人民，在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之前，仍然希望用一切可能取得和平。这样，为了最后挽救和平，并且为了充分教育人民，我党仍然用了极大的努力和忍耐心来領导全国人民試图經过和平談判的道路来避免战爭、实现和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8月25日，我党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了自己的民主团結的愿望。8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了談判，签訂了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我党和全国人民，又迫使蔣介石与我党签訂了停战协定，和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議，通过了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人民的五項决定。可是蔣介石根本就不想实行上述各項协定和决議，而把它們签字和同意的这些协定和决議，作为自己爭取时間、調兵遣将、准备內战的“政略”与“手段”。但是，它却不敢公开地說出自己的这一罪恶阴謀，而在中国人民面前拙劣地玩弄各种花样，以掩盖自己的眞正意图。“解放日报”在这个时期对于国民党这些阴謀，都給予了及时揭露。当蔣介石下令不让我們受降并命令敌伪为他看守地盘“維持秩序”时，“解放日报”指出：蔣介石这样做的眞正目的，就是要以“宁渝合流，蔣伪合作”，代替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日提携，日伪合作”；就是要以蔣介石的“反共建国”，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反共建国”；就是要“鼓舞各地伪軍継續其过去在敌伪統治下的那种反对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滔天罪行”；就是要使蔣介石的大批远处后方的軍队“能够从峨嵋山上源源东下，及时赶到目的地、然后协同伪軍向解放区的人民及軍队进攻”；……一句話，就是要去“世袭”敌伪对中国人民的統治。当着蔣介石装模作样地在双十协定上签字、因而使許多人产生了和平幻想的时候，“解放日报”立即用国民党違犯协定进攻解放区的种种事实，指出了对国民党采取輕信态度是

非常危險的。"解放日报"指出：对于国民党和蔣介石来說，"如果相信他們口里說的好听的字句，如果相信他們白紙上的黑字，那就上了大当"，"現在的事实証明，国民党在10月10日所允許人民的和平，乃是一个假和平"和騙局。"解放日报"向人們指出：在看国民党的时候，必須記住：不要"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当蔣介石利用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議作为自己发动內战的"政略"时候，"解放日报"立即指出："无数的事实标明，国民党和蔣介石是把停战协定、政协决議看作眼中釘"的；他們正在想尽一切"阴謀办法来推翻这些协定和决議"，以便"保持独裁"；因此，"全国人民要提起充分警惕，切不可盲目乐观，以为万事大吉；不！决不是这样！中国法西斯派正在重新組織起来，并正在进行全国規模的动員，向全国人民进行攻击！"

在玩弄上述花样的同时，国民党还为自己制造了种种可耻的借口和論据来为自己的內战阴謀进行辯护，說什么內战的根据是共产党"違犯了蔣委員長的命令"；解决內战的先决条件不是和平民主，而是"軍令政令的統一"；民主可以实現，但是，国民党独裁的"根本大法不容改变"；国民政府可以扩大，但是，不是先改組政府，后軍队国家化，而是必須先把人民軍队交給国民党的"国家"等。为了宣傳这些胡說，国民党不仅动員了自己公开掌握下的所有报紙、通訊社，并且使用了自己最厉害的帮凶"大公报"。"大公报"在1945年11月20日发表的"質中共"的社論，就是专門为国民党开脫內战罪責而写的。"解放日报"一連发表了"人民公敌蔣介石发出了內战信号"、"評蔣介石元旦演說与政治协商会議"、"評国民党扩大政府的意見"、"軍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則"、"中国法西斯派的綱領"、"破产了的政治理論"、"駁蔣介石"、"駁大公报"等二十余篇論文，尖銳地駁斥了国民党及其帮凶的这些胡說，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解放日报"指出：所有国民党及其帮凶的这一切胡說的目的就是要中国人民"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給蔣介石和他周围一小群人去独裁"；就是要中国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而"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軍令政令都无条件的服从"；就是要中国人民在他的屠刀下去要求他"賞賜人民以和平建設、民主政治、民生改善"；就是要找寻借口，推脫內战責任，以便把"中国人民抛下……內战的血海；就是要中国人民永远在一个中世紀的奴隶主和大买办的統治者"手下过日月。为什么是这样呢？"解放日报"指出：就是因为十八年来，中国人民在蔣介石的野蛮統治下，得到了一个寒心的教訓，即"蔣氏的'統一'在若干方面竟与敌伪的'統一'不相上下"；就是因为十八年来的历史証明，在蔣介石統治区，蔣介石的"統一"是一年"比一年多"，但民主却"一年比一年少"，而蔣介石的特务机关、特务軍队却"一年比一年多了"；就是因为十八年来的历史証明，蔣介石式的"民主"，便是他自己的法西斯式的"絕对独断专行"；就是因为十八年来的历史証明，中国人民要民主，要自由，要制止內战，就必須要有一个条件："力量"，而蔣介石却偏偏要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八路軍、新四軍交給国民党"！"解放日报"指出：中国人民必須記住这个历史的教訓：要实現和平、民主，是不能靠"愿望"而是靠"力量"的，"十年內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而停止的；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与張学良、楊虎城領导的东北軍、西北軍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的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无限制的让步与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堅持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因此，"解放日报"継續写道："要和平，要民主，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全国人民团結起来，壯大自己的力量"。"解放日报"以这种丰富的事实和历史經驗为依据的論証，生动确切地宣傳了我党的主張，給了国民党以致命的打击。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政治协商等等欺騙办法，赢得时間之后，就調动了他的全部軍队，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决心用战争来反对中国人民，摧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国民党在战争初期，曾經取得了一些表面的胜利，这种表面的胜利冲昏了他們的头脑，使他們更加迷信起自己的暫时优势来，而决心把內战进行到底。为此，国民党在1946年11月15日，召开了使自己走向絕路的"猪仔"国大，随后又于1947年2月末，采取了驅逐我党代表人員的措施。国民党用这一系列的狂暴行为，最后扑灭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希望，迫使人民不得不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后的决战。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領导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的軍民，奋勇地起来争取战争的胜利，就成了我党在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个时期的"解放日报"，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蔣介石的大打阴謀和卖国罪行；它热烈地歌

颂了解放区軍民奋起抗击国民党进攻的各种英雄行为；它大張旗鼓地宣傳了我軍歼敌致胜的各种消息；它出色地报道和鼓舞了国民党統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正确地指导了解放区軍民的各种实际工作……。但是，它在这个时期的主要功績却是反复地向全国人民說明了蔣軍必败的战爭前途，动員全国人民和我們一道去爭取战爭的胜利。据統計，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止，“解放日报”仅为此发表的重要評論就有二十余篇之多。通过这些評論和其他有关稿件，“解放日报”精当地分析了蔣軍必敗的原因，深刻地闡述了我党領导战爭的战略方針，正确地說明了战爭局势的实际发展，从而多方面地回答了战爭前途問題。战爭初期，“解放日报”首先連續发表了“全解放区人民动員起来，粉碎蔣介石的进攻！”“蔣方軍事五大弱点”、“蔣軍必敗”等著名評論，“爭取全面抵抗的胜利”、“再接再厉爭取全面抵抗的胜利”等社論以及从政治上、經济上、軍事上等各个方面分析了蔣軍必敗的战爭前途。

而战爭的实际发展也証明了“解放日报”論断的正确。当战爭进入1946年11月份，我軍歼灭了蔣軍三十多万以后，在某些战場上便出現了我軍局部反攻的新局面。这种新的局面說明，我軍由战略防御轉为战略反攻，蔣軍由战略进攻轉为战略防御的重大轉变时机已經不远了。然而許多人并不能立即看出这一点，因此，及时地說明这一点，以进一步地在人民群众中解决战爭前途問題，并鼓舞他們更为勇敢地进行斗爭，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为此，从1946年11月份起，“解放日报”又連續发表了“論战局”、“战局在开始变动”、“11月来的战局”等著名社論，系統地分析了战爭的实际发展，及时地揭示了战爭的这种新变化，明确地提出了迎接这一新变化的新任务。

这样，解放日报就不但对战爭前途問題給予了最确切的回答，并且用我党的战无不胜的战略思想和新的战斗的号召武装了全国人民，使他們更有信心地在党的領导下爭取革命战爭的胜利。

这个时期，解放区的报刊除“解放日报”外，在各大战略区大都出版或改出了大型报紙。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立即由二日刊改成日刊。九月，晋察冀解放区“晋察冀日报”迁到張家口出版。东北地区从日軍手中解放后，报刊事业曾有蓬勃的发展，1945年11月，在山海关創办了“东北日报”，以后先后迁本溪、海龙、長春、哈尔濱等地出版；另外，在南滿、西滿等地区也出版了一些报紙。在华中方面，1945年12月9日在江苏淮阴出版了“新华日报”华中版；坚持在鄂豫皖抗日根据地出版达七年之久的“七七报”，抗战胜利后改成日刊，更名“七七日报”，在中原解放区宣化店継續出版；在苏北、淮北等地区，除“盐阜大众报”（三日刊）外，有著名的淮北“拂曉报”，是中共江淮地委机关报，它在环境最严重的年月，一直坚持在洪泽湖上，把胜利的消息不断傳布于淮北各地。1946年5月，随着晋冀魯豫边区的联成一片，在邯鄲出版了全区性的“人民日报”，7月，晋綏边区将原“抗战日报”改为全区性的“晋綏日报”在山西兴县出版。此外，在陝甘宁解放区有著名的“边区群众报”，它在蔣軍的“清剿”中，一直坚持鉛印出版。

另外，在一些新解放区，也出版了一些地方性的小型报紙。随着工矿区的解放，出版了类如山东“新潍坊报”等工人报刊；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出版了类如晋察冀解放区的蒙古文报紙，在一些重要城市还出版了中苏友好协会的报紙。

上述报刊，在这个时期配合“解放日报”揭露蔣介石內战阴謀，以及內战全面爆发后宣傳国民党政治上的反动性，指出蔣介石集团的总弱点是軍心厌战、民心反对、經济危机这三大弱点，反复說明我軍必胜的道理，对鼓舞胜利信心、防止悲观失望情緒和克服前一时期遺留下来的和平幻想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个时期党在爭取和平民主同时准备粉碎蔣介石对解放区进犯的形势下，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因而这个时期的报刊也就負起了宣傳土地改革的重大任务。

抗日战爭胜利之后，在广大的新解放区中，群众发动了清算和沒收汉奸財产的运动，已經涉及到地主阶級中一部分汉奸分子的土地所有权。接着，在新老解放区中，先后进一步展开了貫彻减租减息的反封建斗爭，解放区的报刊也就展开了广泛的宣傳来推动运动的发展。比如1946年1月9日和2月20日“解放日报”两度发表社論，号召“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提出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針，批評了工作中的束手束脚的現象。同时，报刊在宣傳群众运动中，还发表了一些具体生动的通訊报道，揭露了地主阶級的罪恶，提高了农民的阶級觉悟。这些宣傳推动了各解放区群众运动的发展，而这个群众运动实际上起了把减租减息斗爭过渡到土地改革斗爭的作用。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积极支持各地农民在减

租减息运动深入展开中已实行了的土地改革行动，提出了正确的方針，实行由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沒收地主阶級的土地分配給农民的政策。并指示"各地党委必須明确認識解放区的土地問題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須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群众与領导目前的群众运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报刊也广泛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宣傳工作。

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打击了封建势力，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有很大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在报紙上关于土地改革的宣傳中也有所反映，在一定的时期中，許多报紙(包括解放日报在內)在相当程度上出現了宣傳"和平土改"的偏向，沒有强調发揚农民的阶級覚悟向地主阶級展开斗爭。报刊宣傳上的这一偏向反映了当时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缺点。为了把反封建的土地斗爭貫彻到底，中共中央在1947年10月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綱，改正了"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規定了实行消灭封建制度的最彻底的方法，同时并規定了整編党的队伍的步驟的方法，以求解决党的地方組織、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組織中的成份不純和作风不純的問題，这些指示使土地改革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彻底展开起来，这也使党的报刊批判和克服了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右傾偏向。

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之后，党中央沒有另办机关报，新华通訊社实际上完全代替了中央机关报的作用，不只发布新聞通訊，而且播发社論和評論，起了指导战爭和工作的显著作用。

从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战爭的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我軍已由战略防御轉入战略进攻。从此，战爭主要地已經不是在解放区里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統治区进行了。到1948年和1949年，战爭进展更为迅速。人民解放軍已經充分学会了攻城战术，連續攻克了大批国民党"重点設防"城市，經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人民革命战爭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个时期，随着战爭形势的发展，党和人民的报刊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第一，华中等解放区原来因敌軍进攻而遭破坏的报刊紛紛恢复出版。还在1947年4月，苏北軍区就出版了"苏北日报"和通俗的"苏北大众报"。1948年1月华中"新华日报"复刊。东北南滿地区在經过英勇頑强的"四保临江"战役之后，1947年5月恢复了中共南滿分局机关报"辽东日报"。第二，在大反攻中，新解放的地区出版了新区的报紙。由于一部分大中城市解放了，出版了不少城市报紙，例如1947年11月出版的"新石門日报"，1948年1月改名为"石家庄日报"，1948年9月出版的济南"新民主报"等。第三，由于战局的发展，老解放区的报刊作了必要的調整，1948年6月15日，在晋察冀和晋冀魯豫两大解放区合并的情况下，原"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合并，在石家庄出版华北"人民日报"，成为华北地区統一的机关报。

在战爭轉入反攻阶段后，报刊在这个时期的軍事宣傳的要求上也有了变化。这时，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內战的反人民性質已有了清楚的認識，尤其是蔣介石集团悍然宣布所謂"勘乱总动員"，事实眞相更大白于天下，同时，解放軍轉入战略进攻后，事实証明了我軍战略的正确性，胜利誰属的問題也解决了。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固然仍要求繼續宣傳胜利，鼓舞士气，同时防止驕傲，另一方面更需要繼續多方面地揭露蔣介石集团的罪行，强調指出蔣介石自絕于人民，自取灭亡。同时为了迅速爭取胜利，瓦解敌人成了軍事宣傳中一个重要問題。例如关于俘虏和敌軍起义的宣傳在瓦解敌軍上起了显著的作用，这种宣傳从战爭一开始便有了，到反攻阶段，这种宣傳成了軍事宣傳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有关这方面的新聞、通訊，甚至发表敌被俘名单、代被虏軍官轉家信等报道，充分反映了我軍对俘虏的寬大政策，通过俘虏的口說明我軍不可抵抗的威力，暴露蔣介石集团內部的黑暗，不只起了瓦解敌軍的作用，并对国民党統治区的广大社会阶层起了广泛的影响。

此外，这个时期，有的党中央負責同志亲自为报刊写軍事宣傳稿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有历史背景的生动介紹和軍事形势的精辟分析，是这个时期中軍事新聞的典范。

二

抗日战爭結束以后，党在国民党統治区，除繼續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以外，还在北京創办了"解放报"。

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之后，"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一起，从各方面闡释党在时局宣言中提出的主張，同时不断报道和揭露蔣介石集团拒絕解放軍向敌人收复失地反而与敌伪合流，甚至指使敌伪繼續向解放区进攻的事实，使人民对內战危险保持应有的警惕。这时，八年抗战的苦难刚刚过去，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复員，蔣介石集团在輿論的压力下，为了用

和平的伪装掩飾备战的步驟，不得不在十月十日签訂了关于实現民主和平的“国共会談紀要”，这是党和人民的一項胜利。

“国共会談紀要”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实行了自己所同意的协議；但是蔣介石集团却只把这些协議看做是掩护发动战爭的烟幕，所以在协定公布后，蔣介石立即向国民党各軍事将領頒布內战密令。还在9月中旬，蔣介石集团即发动了向我綏东解放区張家口上党和沿平汉路向晋冀魯豫解放区大举进攻。蔣介石集团掌握下的一切反动报刊无耻地把內战責任推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身上，因而，說明战爭責任誰属，“誰放了第一枪”，并展开反內战斗爭，成了当时党和人民报刊宣傳斗爭中的中心問題。党的报刊在新聞报道和評論中有力地說明了事实的眞象。起了特別显著作用的是报紙公布了在“双十会談紀要”公布前夕由蔣介石亲自电发給国民党軍队的“剿匪手冊”的摘录和代电全文，以及国民党高級司令官們頒发的进攻解放区的命令和作战計划，鉄証如山不可辯駁地証实蔣介石集团是发动內战的罪人。在評論中，党的报刊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公报”展开了剧烈的論战，辯論了內战的責任，指斥了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教育人民消除对国民党政权的正統观念。这时，党在国民党統治区領导和支持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社会阶层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要求停止內战、实行民主和平的广泛的斗爭。党的报刊，尤其是“新华日报”，发表新聞报道、評論，刊載民主党派的文件和民主人士的文章，反映讀者群众的呼声，用各种办法支持这种斗爭。

蔣管区的人民对国民党蔣介石集团的口是心非、背信弃义、破坏和平的行动，表示非常憤怒。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反对內战联合会”，号召国民党統治区的人民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的內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內政。云南昆明的学生也于11月25日开始展开了反內战爱国运动，12月1日，这一运动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屠杀和鎮压，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慘案；在其它城市也相继发生了学生示威罢課运动，来反对蔣介石的独裁內战政策，把反內战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报刊有力地宣傳了这些重大事件。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发現他們的准备工作还很不充分，被迫在1946年1月頒布停战令，并开始举行政治协商会議。

在会議期間，“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就会上討論的政府組織問題、施政綱領問題、軍事問題、国民大会問題、宪法草案問題等几个中心問題，正面地闡述了党的意見。党报在斗爭中严正地駁斥了“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强調統一而实質上是維护法西斯統治、反对民主的主張，揭露了这些报刊所申述的国民党集团的“你交出軍队我給你民主”的欺騙論調，“新华日报”用大量篇幅，有时出增刊，广泛反映了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民群众的意見，督促会議作出合理的决議。終于在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在会議上不能不接受和通过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議。

但政协决議一公布，蔣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便公然开始了。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搗毁了重庆人民庆祝政治协商会議成功大会，毆打与会人士，这就是有名的“校場口事件”。三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四月，由反动派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将旧政协所制定的和平团結的方針完全推翻了。与此同时，蔣介石在东北大举进攻，并在关內各地积极准备大規模內战。在这一形势下，党报和各种民主报刊又积极展开了維护政协决議、反对內战罪行的宣傳斗爭。“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其他报刊，从政治上揭露了蔣介石集团違反政协决議的背叛性，从理論上指斥了他們的破产政治理論的法西斯性，并且揭露了国民党进攻和围困解放区的事实，宣傳了人民軍队抵抗蔣軍进犯的英勇斗爭。蔣介石集团为了給他的进攻东北制造口实，并利用人民的民族感情以激起反共情緒，特地制造了所謂东北問題，企图煽起反苏反共的高潮，并且确实产生了一定的蠱惑作用。党的报刊坚决地回击了这种挑衅，着重宣傳了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爭，說明东北問題的眞相，击破了反苏反共的誣蔑，揭穿了蔣介石集团利用民族主义口号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奸計，大大提高了国民党統治区人民的觉悟。

这个时期，党在国民党統治区的报刊除“新华日报”外，在政治协商会議之后，决定在北京（当时称北平）成立軍事調处执行部的情况下，党就在北平創办了一个公开的机关报，即“北平解放报”，并同时成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北平解放日报”于1946年2月22日出版（原为三日刊，自27期改为二日刊），出版时正当国民党特务搗毁“軍調部”办公室的次日，这就預示了它的艰难的环境；但是，它一出版便宣布“以致力和平民主建設为宗旨”，坚定不屈地向华北国民党統治区的人民宣傳了党的政策，和国民党集团的反共宣傳作了剧烈的斗爭，并向人民报道了解放区的建設成就。正因如此，4月3日，国民党特务竟借口檢查戶口非法逮

捕报社和新华社的主要工作人員，企图迫使报社停刊。但报紙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坚持了出版发行工作，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罪行。最后，蔣介石集团在它坚持发动全国內战的步驟日益加强的同时，公然在5月29日封閉了北平解放报和新华分社，再一次暴露了它发动全国內战的野心。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的代表机关也迁往南京，政治斗爭的中心随之移到京滬地区。当国內政治斗爭中心轉到京滬时，党原决定把"新华日报"总社迁往上海，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同时出版，并已实行把原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改成四川省委的机关报，成为"新华日报"的重庆版。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新华日报"两版的筹备工作都已完成，但国民党集团不敢让党的机关报在京滬地区出版，完全背弃了它关于言論出版自由的保証，不允許"新华日报"出版。这样"北平解放报"被封后，党在国民党統治的广大收复区中又处于完全没有公开机关报的境地。因此，党决定首先在上海出版"群众"周刊，作为党在这个地区的公开机关报。"群众"自抗战胜利后繼續在重庆出版半月刊，除轉載"解放日报"的重要文件之外，是一种比較侧重于理論斗爭和指导进步的学术文化运动的刊物，和"新华日报"有互相配合的作用。从第十一卷第五期（1946年6月3日出版）开始，便負起了新的使命。它必須兼有报紙和杂志的特点，兼顧宣傳鼓动工作，并尽可能联系广大社会阶层和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讀者，使党的主張可以經常貫徹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为此，刊物改成了24頁的中型周刊，內容多样而文章形式短小精悍以适应客观的需要。撰稿人有陈伯达、李維汉、潘梓年等同志。"群众"周刊在上海复刊时，国民党軍对东北地区的进攻早已开始，关內的大打也在准备中，和平談判却是在談談打打中拖延。党在宣傳中的中心要求便是反复彻底揭露蔣介石集团的內战政策、教育人民，并宣傳党为爭取和平反对內战所作的仁至义尽的努力。"群众"周刊以主要篇幅刊載中共中央及駐南京代表团的文件和談話，和国民党进行尖銳的政治斗爭。这时，全国人民反对內战爭取民主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例如6月上海人民的反內战大示威；抗議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聞一多的运动；12月上海攤販事件等，"群众"周刊用很大的力量报道和支持了这些斗爭，揭露国民党地区的特务横行和經济破产，支持人民群众反对內战、爭取保障生活的要求。此外，报道解放区的民主生活和建設成就也占重要的地位。

1947年3月，蔣介石集团进攻延安前后，就不再作任何伪飾，强制将党在国民党統治区的代表机关遣回延安，党的报刊也全部被迫停刊，上海"群众"周刊迁香港出版，重庆"新华日报"全体人員撤退到解放区。

除上述"新华日报"，"北平解放报"，"群众"周刊外，这个时期在党直接和間接地領导和影响下的报刊还有"建国日报"、"消息"、"文萃"等許多报刊。

"建国日报"，1945年10月10日創刊，由郭沫若发行，夏衍主編，是抗日战爭时期"救亡日报"的复刊，它"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統一的大旗之下，为实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但出版仅两周，到10月24日第15号便被国民党文化特务詹文滸所封閉。"消息"，1946年4月出版，由夏衍、姚溱等主編，它是以报导政治新聞为中心具有强烈的揭露性的半周刊，但出版到5月即被封。"文萃"周刊，1945年10月出版，夏衍、姚溱、孟秋江等主編，它起初是以轉載重庆，昆明等地党和进步报刊上的文章为主的文摘性刊物，以后也改成了政論性的綜合刊物。47年3月被迫停刊，此后即轉入地下，改成叢刊形式秘密出版和发行，例如"論喝倒采"、"台湾眞相"、"人权之歌"、"新畜生頌"、"五月的随想"、"論紙老虎"、"烽火东北"等。7月，編輯和工作人員共产党員陈子涛等三同志被捕(全国解放前夕牺牲)，刊物也被迫停刊。

总之，自抗日战爭結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新聞事业的迫害大大加强起来，据統計仅北京、南京、上海、重庆四地，半年內就有一百几十家报紙和杂志被封閉、被搗毁，大批报刊工作者遭到逮捕和杀害。1946年在全面內战爆发前夜，国民党又实行了一次对党的和民主报刊的大扫蕩，4月"北平解放报"和新华分社一下就被捕去三、四十人。5月，和"北平解放报"同时被封的报刊、通訊社就达七十多家。在残暴的白色恐怖下，党的报刊仅能出一种周刊的情况下，党在国統区的宣傳工作确实受着限制，在克服这种困难方面，上海的进步民主刊物起了重要的作用。上海是有深远的革命文化斗爭傳統的城市，自抗战胜利后，虽因蔣介石集团的压制而不能出版日报，但进步的文化工作者还是出版了一些以时事政治为中心的綜合性刊物。除前述"建国日报"等报刊外，有广泛影响的是"周报"和"民主"周刊。"周报"，1945年9月創刊，由柯灵、唐弢主編，撰稿人有平心、周建人等，它是抗

战期間留在上海的民主派知識分子的刊物。同年10月，又出版了性質相近的"民主"周刊，由郑振鐸等編輯，撰稿人有馬叙伦等。这两种刊物，在其前期曾多少明显地反映了一些对資产阶級民主制度的向往，实际上反映了知識分子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但是它們又都持有比較坚定的要求民主、反对內战的立場，并随着时局的发展而逐漸明显地加强了它的战斗性。但"周报"在1946年8月，即被蔣介石集团借口"未經核准登記"勒令停刊；"民主"周刊发行到1946年10月和"周报"一样，遭到被迫停刊的命运。

到了1947年7月，刘、邓大軍南渡黃河，人民解放軍由战略防御轉入战略进攻，战爭主要地已經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統治区进行的情况下，蔣介石集团的反动統治就更加瘋狂了。1948年4月継續封閉了仅存的几种民主派刊物，如"世界知識"、"国訊"（1947年5月在上海复刊，由黃炎培发行）、"时与文"（1947年3月創刊，由程博洪发行）等；5月又封閉了苏商"时代日报"（中文版）；7月，連与国民党有相当关系的某些民間报紙，如"新民报"等，也因为发表了不利于蔣介石集团的材料而被封閉。

三

到1948年底，蔣介石兵敗如山倒，他已无力支撑危局了，也就在这时（1949年1月）蔣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不久又伪裝宣布"引退"，一幕假和平的花样便由此开始了。在蔣介石发出求和声明的同时，国民党动員它的宣傳机构进行蠱惑人心的假和平宣傳，妄想"无条件停战"，因此，党的通訊社和报刊展开了打退这种和平攻势的斗爭，进行反对假和平主張眞和平的宣傳。例如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詞"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蔣介石李宗仁优劣論"等都是战斗的杂文和政論的最好的結合。此外，为了回答敌人的假和平阴謀，毛泽东同志在1月14日发表了时局声明，宣布和平談判的八項条件。新华社在輿論斗爭中闡释了这些貫徹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条件，并特別着重說明了象懲办战爭罪犯、废除伪法統这样的重要条件，使眞和平和假和平对立起来。最后，在国民党进行和平阴謀的时候，1月22日在北京实行了区域性的和平解决，这就为实現眞正的和平作出了一个具体的榜样。新华社在輿論斗爭中充分宣傳了这个例証。

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政府拒絕了經过商談而拟定的国內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国人民解放軍百万大軍大举向江南进軍，并随即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这时，建立新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就成了政治上的一个中心問題。1949年6月，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議的筹备会。7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专政"，总結了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經驗，并奠定了建立新国家的理論基础。由此，展开了准备建立新国家的广泛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党和人民的报刊报道了这些重大的事件，作了团結全国人民准备建設新中国的宣傳。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全国性的报紙刊物也开始建立起来。华北"人民日报"1949年3月迁北京出版，逐漸开始起全国性的作用，为改組成中共中央机关报准备了条件。同年6月，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京出版（1953年改为各民主党派联合机关报）。7月，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出版。重要的全国性刊物如"中国青年"、"学习"、"文艺报"等也先后出版。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中，对美帝国主义的認識和所謂第三条道路的批判在知識分子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問題。恰在这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名为"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其他有关資料，为解决我国內部思想問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中共中央直接主持之下，新华社发表了"白皮书"的摘要和六篇有重要意义的評"白皮书"的社論。这些社論在全国引起了一个学习运动，帮助中間派的知識分子初步看清了方向，并使他們中間的积极分子懂得，用資产阶級民主来反对人民民主实际上是为美帝国主义者艾奇逊之流火中取栗。美帝国主义者所謂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就是充滿旧民主主义观念和第三条道路幻想的自由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改造，資产阶級自由主义思想的克服，是一个長期的任务。社論指出："他們的头腦中尙殘留着許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們是除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人民中国的中間派，或右派。"因此，应該"用善意去帮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动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們拉过去，叫他們丟掉幻想，准备斗爭"。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次全体会議开会，9月29日通过共同綱領。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标志着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也标志着党的报刊事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关于中國苏維埃經济建設工作的一些情况

譚 双 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爭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和积极策动下，对苏維埃区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軍事"围剿"，并实行了极其殘酷的經济封鎖，他們狂妄地叫嚷："务使赤区无勺水粒米之輸入，无蚊虻蝇蚋之通风"，并为此先后制訂了封鎖苏区的条例不下十余种，妄想这样来扼杀苏維埃政权。

当时苏区的經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或小商緊密結合的个体經济，农民不但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又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兼营小商。据毛主席于1930年10月在江西兴国县永丰区的調查，参加調查会的八戶农民中，就有六戶兼做爆竹、篾匠、泥水匠、开小屠坊、摆油盐摊子和替杂貨店管帳等。这六戶共43人，每年生活費用共需300担谷左右，其中农副业生产收入約174石，此外靠兼营手工业或小商的收入来弥补不足的126石，占每年总收入的42%（参考："农村調查"，解放社1949年版，第9—20頁）。还有"乡村中以农为主商为輔的（八成靠农、二成靠商）很多，約占全部人家的百分之四十，这种人多数是貧农，少数是中农，因为生活不够，做点肩挑生意补足生活"（同上，第52頁）。这种个体小商品經济在苏区占了絕对的优势。

小商品經济十分需要地方性的流通自由，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鎖政策，使得苏区这种地方流通自由遭受了极大的阻碍，因而給苏区带来了严重的經济困难，这种困难首先反映在某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感到奇缺，特别是食盐和粮食："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貴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农村調查"，第184頁）粮价亦因国民党反动派封鎖而极不正常，一方面"每石糙米的价格，汀州涨到十八元二角，上杭更貴，瑞金十五元，灵都十三元三角，博生十元九角，……"（"斗爭"十一期"怎样解决粮食問題"）而另一方面"如象江西产米的贛县、万太、公略等县，因为生产品的过剩，每担谷子往往跌价到一元都不到，这样农民不但不賺錢而且还每担賠錢五、六角，如斯，农民对于提高土地生产力就失去兴趣，荒田荒地因此有时会增加起来"（"斗爭"十一期"論苏維埃經济发展的前途"）。

生活的困难，必然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不但农业，工业也是如此，如"紅旗"六十二期所載："在工业方面，亦是因为敌人的長年封鎖，苏区的紙，烟草，木材，樟脑，鎢矿等主要生产，均陷于低落的状态"。据毛主席对福建上杭才溪区的調查："烟——暴动前每毛买二两，現在每毛一两六錢"；"紙——暴动前每球(四十斤)草紙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元五角，因此无人造紙了"；"鉄——比暴动前貴一倍"（"农村調查"，第184頁）。生产事业的下降反过来又使人民生活的困难加深。此外，由于流通自由的人为障碍，使得工农业生产的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又使得投入流通的商品价格总額减少了，并进一步影响了苏区对外貿易的发展。

由此可見，苏区的經济困难，无論从生活、生产的角度或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影响了革命战爭的物資供应，如汀州、瑞金一带的粮食缺乏，使东南战綫和首都紅軍部队的給养感到十分困难。贛南的紅軍士兵每天只食两餐，时常吃粥，軍餉只有伙食費每人每日一角二分甚至还不到。贛西也不得不"减少政費及政府服务人員之生活費，每人每月仅发零用錢二元，各級經常工作人員，亦比較减少（苏維埃区七人，乡三人）"（見中国现代史資料編輯委員会翻印"中国苏維埃"，第79頁）。另一方面，"因为这种經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級忍不住，工人貧农和紅軍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73頁）这說明进行經济建設，克服經济困难成为当时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毛主席指出，在击潰敌人軍事"围剿"的同时，需要"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济建設，去冲破敌人的經济封鎖的毒計"；"集中經济力量供給战爭，同时极力改良民

余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經济方面的联合，保証无产阶級对于农民的領导，爭取国营經济对私人經济的領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25頁）。这就是苏区經济建設和經济政策的总原则。

苏維埃的經济建設的內容是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合作社运动和对外貿易；而且首先是发展农业。毛主席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們經济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問題，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26頁）

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碰見两个最大的困难，一是劳力不足，一是資金缺乏，而这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所謂劳力不足，主要是指能参加耕田的人太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罪恶統治，多少人被殘害，多少人成了废疾，据当年毛主席在江西的純化、安福、太和、新喻等地的調查，“全般說来，无劳力的占人口全数75%，即四个人中只有一个壯丁有充分力量耕田，这是中国的大問題”（“农村調查”，第106頁）；加以随着革命战爭的胜利发展，农民不断地掀起了参軍参战的高潮，如江西兴国的長岡乡，本来全劳力和半劳力共450人，只占全人口的25.2%，而出外当紅軍做工作的就有320人，除十几人属于半劳力外，全部都是全劳力，留下来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儿童，福建上杭县的上才溪乡，留下十六至五十五岁的男女劳力中，女的占89%，男的只占11%，下才溪留下的女占67%，男占33%（参考：“农村調查”，第143頁）。可見当时能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紧張到如何的程度！

其次是指牛力問題。牛力缺少的原因有三：（1）国民党反动派在軍事“围剿”中实行劫掠，其所到之处，“凡属农民的谷米牲畜以至于火鍋菜刀破衣敗絮，无不搶劫一空，若搬走不了，就用火燒，或灌以屎尿”（見“中国苏維埃”，第90頁）；（2）許多地区的地主富农和奸商等故意宰杀耕牛，或将苏区的耕牛偷运白区出卖；（3）某些地方对沒收征收过来的耕牛分配不妥，或保管不力，以至受了損害。这些原因就使耕牛大缺。瑞金石水乡无牛的占30%，兴国長岡乡无牛的占25%，上杭才溪乡无牛的占20%，据此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25%；就是在有牛的人家中，往往一家一牛的只占50%（小牛多），二家一牛的15%，三家一牛及四家一牛的30%，五家以上共一牛的5%（参考：“农村調查”第146—147頁），在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次于人工，所以耕牛問題就显得較为严重。

此外如开荒修堤、增加肥料、种子等都是存在一定困难的。所有这些困难問題的解决，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資金，而这不是一家一戶的分散的农民經济所能解决得了的，而苏維埃政权又因为一方面財政收入困难，一方面日益发展的革命战爭所需費用甚多，拿不出更多的錢来搞經济建設。面对着这一系列的困难，党和苏維埃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是把群众組織起来，搞互助合作运动。这是战胜一切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唯一正确的途徑。

互助合作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它在农业战綫上的重要任务就是有組織地調剂人力和牛力。

劳动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紅属、帮助孤老和社員群众的互助。所謂优待紅属与帮助孤老，即根据各乡具体情况，按劳力强弱規定其平均每月帮多少工，忙月較閒月多忙几工，一般都不接工錢，帮助紅属还自带飯。社員互助是以工易工，少做了的，按工算錢于多做了的，工价民主評定。这些都由互助社委員会統一領导与組織，互助社委員五人，內主任、組織、宣傳各一，受乡的秋收秋耕委員会指导。

作为劳动互助社的补充形式就是耕田队、突击队和輕騎队的組織。耕田队每村一队或几队，設正副队長，下轄三个小队，由三人或七人組成，每小队管附近几家或几十家的耕作事宜，有时为了使組織上統一起来，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突击队不只是要以突击精神去完成自己的耕种計划，而且还須經常帮助劳力薄弱的农戶与乡村，亦如期完成計划。在某种情况下，为了耕种紅軍公田，需要組織特別的耕田队，为了深入检查工作，及时揭露耕作中消极怠工或其他不良现象，需要組織輕騎队（参考“青年实話”二卷，第十七期“兴国的耕种方法”）。这就是关于調剂人力的組織形式。

推广这些劳动互助組織的优点是：（1）便于以村为单位全盘計划生产；（2）便于广泛地动員妇女、老弱到生产战綫上来，以发掘社会生产的潛力，如瑞金县实行劳动互助后，即有原来不事生产的三千多名妇女成立260个生产小組，加入农业生产（見1934年7月19日“紅色中华报”）；（3）便于培养和提高社員的集体观念和政治思想觉悟。由于有这許多优点，劳动互助社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到1934年4月，在兴国一县即有386个社，有49,586个社員(見1934年5月28日“紅色中华报)，其中如長岡乡四村每村一个，除紅属外，凡有劳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农村調查”第143頁）。

解决牛力不足的問題主要是成立犁牛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的耕牛来源是：（1）沒收与征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2）在互助两利的原則下，动員有耕牛农具的农民加入合作社并給以相当的租金；（3）发动群众集股买牛，股金按分田多少而定；（4）必要时可向苏維埃財經部門借得一部分資金买牛，分期償还。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普遍适用的則是第三項，办法是在自愿原則下，每家照分田数每担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如兴国長岡乡每人分田六担二斗，无牛的109家，平均每家4人共436人，分田共2703担，每担3升得谷81担，谷每担5元得錢405元，以20元买一牛計得20头，每牛耕田80担共可耕田1600担，对于2703担，已解决了一大半，过一年再出两升，即可完全解决（見“农村調查”第146頁）。这眞是“小錢成大事”，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对于农业資金問題的解决，是組織群众性的消費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等，如油、盐、肉、布疋、豆腐、糖果等供銷合作社就曾普遍建立，这就解决了农业資金的困难，并活跃了苏区的經济生活。

此外，党和苏維埃政府还組織了群众性的开荒修堤运动，使有些县如兴国县完全消灭了荒田，甚至連荒蕪几十年的死地也都开种起来。中央苏区1933年开荒79,000担田，1934年几个月又开出荒田8,300担田（見“斗争”72期，定一：“两个政权——两个收成”）。水利建設也取得巨大成就，如“中央苏区到1934年，旧的坡圳池塘几乎全部修好，瑞金附近大埔的十里長堤和新桥十七里長堤，也都很快修成，可以灌溉数千里田的池塘，新修筑了許多”(見“斗争”54期，定一：“春耕运动在瑞金”）。

以上就是党和苏維埃政府領导农业生产运动的一个方面的工作，即巨大的組織工作。另一方面，党和苏維埃政府还加强农业生产战綫上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地是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广泛发动反懶惰斗爭，提出响亮的口号，如：“不劳动者不得食”，“懶惰的便不是革命者”……等，以防止那种認为分得土地后生活有了着落便不勤劳生产的落后倾向；另一面則提倡优耕竞赛运动。实行耕作的家与家、村与村、乡与乡的比賽。比賽的項目是簡单明了的几項中心工作，有具体数目字的規定。群众自动訂立条約后，定期举行評比，成績优异者由苏維埃政府发給奖旗、奖状或奖給耕畜农具等，这是推动生产的重要方法，也是群众的自我教育形式。

由于党和苏維埃政府进行了巨大复杂的組織工作和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但扭轉了土地革命初期的下降趋势，而且逐步达到或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水平。如中央苏区所属各县历年来的农业增产情形如下：

县份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兴国	5成	6.5成	7成
龙岡	6成	6成	6成
洛口	6.5成	6成	7成
博生	5成	6成	7成
胜利	6成	6.5成	6.9成
万泰	5成	6.5成	5.5成
黃城		5.5成	7成
石城	5.3成	6.8成	7.3成
上杭		1成	1成
西江		1.5成	1成
兆征		1成	1.7成
全昌		7.8成	8成
楊殷		1.5成	7.1成
長胜	7.5成	7.5成	7.5成
公略		減3/10成	7.5成
新泉	7.6成	7.6成	7.6成
太雷	5.4成	6.7成	7.3成
灵都		6.5成	6.7成
登賢		6.75成	7.12成
贛县		6.23成	6.27成
瑞金		6.1成	7.2成
宁化		6.0成	

（上表摘自“斗爭”72期，定一：“两个政权——两个收成”）

同时，其他几个主要苏維埃区的农业生产量都有所提高，这反映农业生产建設上的巨大成就。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相应地发展了工业生产，加强了商品流通。在工商业方面，党和苏維埃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有条件地容許并鼓励私人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发展国营企业和大搞群众性的合作社运动。这是当时发展工商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和方法。

在苏区当时的經济情况下，容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1）它可以帮助丰富社会的产品，帮助发展苏区內外的物資交流，从而更广泛地满足革命战爭的物质需要和群众生活的必要供給；（2）党和苏維埃政府可以利用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关系"、"貿易路綫"及其經营經驗等来发展苏維埃經济；（3）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可以增加苏維埃的財政收入；（4）还可以帮助克服由于国民党的長期封鎖所造成的或因白色恐怖而避难到苏区来的部分失业現象。因此，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頒布的"工商业投資暫行条例"第一条規定："凡遵守苏維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維埃政府所頒布之稅則，而完納国稅的条件下，得允許私有資本在中华苏維埃共和国境內自由投資經营工商业。"（見"苏維埃中国"，第96頁）

在容許并鼓励私人資本主义的发展的同时，党和苏維埃政府对私人資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表現在如下三方面：（1）經过劳动法限制其对工人的剝削；（2）尽可能地实行工人监督生产，防止資本家利用企业进行各种破坏活动；（3）按資本大小規定累进税的税率。在"工商业投資暫行条例"第五条規定："如有違反苏維埃政府的法令或阴謀反动破坏苏維埃經济者，要受苏維埃政府法律的制裁。"（見"苏維埃中国"，第96頁）

这就是党和苏維埃政府对于私人資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原則。

此外，苏維埃政府对于外国資本，是"……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經济命脈，实行国有（租界、銀行、海关、鉄路、航业、矿山、工厂等）"；另一方面"在目前允許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定租借条約，継續生产，但必須遵守苏維埃一切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以上見中华工农兵苏維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經济政策的决議案"四，載"苏維埃中国"，第89頁。）

党和苏維埃政府的工商业政策的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企业和大搞群众性合作社运动，特別是要使合作社成为发展苏維埃經济的一个主要方式。

在激烈的战爭环境中，国营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軍需工业。当时在中央区及其他各区一般都設有兵工厂、子彈厂、炸彈厂、被服厂、紡織厂、笠厂等，各有工人数百人或千人以上，据1934年3月不完全的統計，中央区有規模較大的軍需工厂33座。同时为了滿足工农群众的物质生活，国家也极力发展民需工业，如制盐业、制糖业、紡織业、煤礦业、炼鉄业、农具制造业以及紙張、烟草、樟脑、肥料、医药、鎢砂等。由于战爭条件的限制，这些工业都只能是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軍需工业一般皆为国营，民需工业一般以民营为主，国营为副，使国营和民营相結合。在生产設备上，机械操作与手工劳动并重（参考吳亮平："經济建設的初步总結"，載"斗爭"第29期）。

另一方面则是大規模地发展群众性的合作社运动。当时合作社的种类有三：即生产合作社如紙張、石灰、鎢砂、煤炭……等合作社及重点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农場等，消費合作社如油、盐、布疋及粮食等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經济的发展很快。据1933年9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統計，各种合作社共1,423个，股金305,551元，瑞金、兴国等县由于經济建設大会的提倡，在大会后一个多月的发展，即赶上大会前整个时期的数目（見"苏維埃中国"，第281頁）。特別是消費合作社的发展更加迅速，如瑞金县大会前社員只9,000人，資本11,000元，大会后一个月增加社員5,300人，資本5,500元；粮食合作社在大会前虽极少，但大会后的一个月間，却增加了6,800个社員和8,900元的資本。在兴国大会后，社員亦是增加了14,600人，这个数字几乎等于大会前的全数字（参考："紅旗"六十二期"中国苏区經济建設初步的总結算"）。群众反映說："合作社第一好"，"就是当衣服亦要加入合作社"，这說明合作社是如何地受到群众的欢迎！

这种合作社經济不仅数量上发展快，而且性质上和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有原則的不同，它已具有鮮明的社会主义成份，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首先从所有制方面来看，这种"合作社須由工

农劳动群众集资組織的，富农、資本家及剝削者均无权組織和参加”（中华苏維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暫行組織条例的决議，第二条，載“苏維埃中国”，第94頁）。社員股金和入股数目，以一般劳动人民都能担負为原則，即“每个社員其入股的数目不能超过十股。每股金額不能超过五元，以防止少数人之操縱”（同上文第五条）。这些股金投入合作社后就成为合作社的公共資金，其用途亦需通过社务会議討論决定。因此在合作社內，不但没有人剝削人的关系，就是一切財产的使用和审核也不是任何少数人所能操縱的。这就使合作社实际上成了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一种經济組織。

其次从合作社的經营方針来看，它不是单純追逐本身利潤的狹隘小集体，而是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爭和改善群众生活服务的。如在上述“决議”中同时規定：“消費、生产，信用合作社之社員不仅兼股东，并且是該社的直接消費者，生产者“（同上第三条）；“消費，信用合作社之消費者，借貸者，要以社員为主体。……对于非社員之价目和利息，亦不能超过社会一般規定之上”（同上第四条）；消費合作社对于紅軍家属还有特价优待。同时合作社自身就是“抵制資本家的剝削和怠工，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有力的武器”（同上第一条）。更重要的还在于合作社执行这些任务时，是在各級党委和苏維埃政府的領导监督和物質帮助（如免稅运輸等等方面）下进行的，这不但支持了合作社的工作，同时保証了合作社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能貫彻党的路綫和政策。

再次从合作社的分配情形来看，合作社利潤的分配絕大部分是用在增加合作社的固定資金、扩大供銷业务和增进社員的公共福利事业，只拿出一小部份分紅，据毛主席对兴国上社区的調查，区社利潤“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員审查委員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紅属儿童买紙笔），百分之三十分紅”，就在分紅部分，有时“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見“农村調查”第149頁）。分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物質上鼓励社員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性，密切合作社同社員群众的关系，它和以漁利分紅为唯一目的的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是有本質区别的。

总之，不論从合作社的所有制、經营方針及其分配原則等方面看来，都带有了鮮明的社会主义成份，但和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济又有所区别，因为这种合作社基本上是以社員的私有財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不过和国营經济配合起来，在苏区的社会經济中已构成了一支极大的力量。

苏区合作社运动的发展，相应地要求对外貿易事业的加强，加强对外貿易正是打破国民党經济封鎖的直接斗爭手段。在这条战綫上，党和苏維埃政府同样采用国家力量和群众力量相結合的办法，一方面广泛地容許并鼓励群众中的私人貿易活动，国家貿易机关只給以必要的监督和管制，以保障苏区必需商品的供应和控制現金外溢；另一方面国家对外貿易局在各县設立貿易分局或购入处，又直接經营进出口貿易。如1934年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曾組織大規模的出口公司——中华商业公司，該公司可与福州、厦門、广州、上海等地进行广泛的貿易活动，并以少量的資金完成了巨大的商品流轉的任务，因而就使国民党的严密經济封鎖归于失敗。

由于党和苏維埃政府执行上述的經济政策，就使苏区社会經济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是，封建經济和买办經济被彻底地消除了，自由泛濫的資本主义經济受到必要的限制，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济和具有社会主义成份的合作社經济适应革命的需要而日益成長并逐漸取得領导的与优越的地位。也就是說苏区社会經济已經成为一种新民主主义經济体系，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断地准备条件。而这种新民主主义經济比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經济則有无比的优越性，这不仅表現在上述的社会劳动力的被充分地运用起来、劳动效率不断的增强、工农业生产量迅速地提高等方面，同时也表現在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例如工人的生活，“苏区各地的实际工資，比較革命前，是一般的增加了”，“汀州市工人的工資比战前最少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木匠），最多的竟增加了百分之一千四百五十，即增加十四倍半（布业工人）”（見“苏維埃中国”，第268頁）。农民生活，有的地区就只用粮和吃肉来說，比暴动前改善一倍，穿衣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一倍半（参考“农村調查”第182—183頁）。这样，在改善工农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就使得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以及工农民主专政进一步地巩固了，从而为革命战爭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証。

清代前期各族人民經济联系加强的一些資料

欧 陽 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族人民就有着不断的接触和广泛的联系。到了清代前期各族人民間經济的联系，文化的交流，反統治阶級斗爭的結合，其友誼之深長，关系之亲切，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緊密。其具体情况如何？中学中国历史課本曾有概括的介紹。但我覚得由于資料的缺乏，在講述这一問題时，还不能詳細講述这一时期中各族人民經济联系加强的情况，因此本文想就清代前期各族人民經济联系加强的情况，提出一些零星片断的資料，作为教学中的一点补充参考資料。

清代前期各族人民經济联系加强的原因，中学課本中曾指出，是由于清帝国疆域的扩大，“在疆域广大的国家里，在統一的政权下面，各族人民之間有广泛的經济文化联系，边疆跟內地的联系更密切起来了”。当然清帝国广大的版图和統一政权給各族人民的經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是各族人民經济联系加强的原因之一。但主要的还是由于經济的发展。自明中叶以后，資本主义有了萌芽，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相当高的发展。清代初期資本主义关系虽然遭到了萎縮，但經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由于劳动人民的努力，社会經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資本主义关系也相应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經济的发展，商品經济的繁荣，各族之間的貿易往来頻繁了。在边疆、在各兄弟民族居住的地区，商业城市也不断的增多和繁荣。如新疆的昌吉城，“店鋪櫛比，市衢寬敞，人民杂輳，茶寮酒肆，优伶歌童，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①叶尔羌城也是回疆一大城市，“中国商賈，山陝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販貨其地。”②每当市集之时，“貨若云屯，人若蜂聚。”③“四川的打箭鑪，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經之地，百貨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手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④青海的西宁、河州、松番，蒙古的庫伦、科布多，云南的北胜州，湖南的辰州，等城市，都是当时各兄弟民族交换貨物的重要場所。这許許多多商业城市的繁荣，使境內各兄弟民族有了緊密的經济联系。所以我們說經济的发展，資本主义的萌芽，是清代前期各族人民緊密联系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也是各民族人民在此时期經济联系加强的重要原因。再其次，是由于在長期的民族斗爭和阶級斗爭过程中，各族人民相互迁移和相互融合进一步发展的結果。在我国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过大小不同規模的阶級战爭和各族統治集团之間以及各族統治集团內部的战爭。这些斗爭都是統治阶級所制造出来的，其目的都是統治阶級为了奴役和压迫各族及本族的劳动人民。各族人民为了反对迫害和爭取生存，常被迫相互迁移，其中尤以汉族人民迁移到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为最多。因此在客观上加强了各族人民在經济上的联系。而清代統一帝国的建立，資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又为各族人民的經济联系創造了前提，就使得清代前期各族人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济联系的加强。

清代前期各族人民經济联系的加强，表現在各族之間的貿易关系更为发展，边疆与內地貨物交换日益增多。清政府虽然用了不少办法禁止各族人民間經济的交流，但在各族人民迫切要求交流經济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松弛禁令，或規定地点进行貿易，如規定“本朝茶法，陝西給番易馬”。并設了不少的茶馬司，如洮岷茶馬司、西宁茶馬司、庄浪茶馬司、甘州茶馬司。順治二年又“題准甘鎭以茶易

① “新疆紀略”。
② “青照堂丛书”三編，西域見聞录。
③ “新疆紀略”。
④ “清稗类鈔”第十七册，农商类。

馬，各番許于开市处互市。”康熙四年“复准云南北胜州开茶市馬，商人买茶易馬者，每两抽稅三分，該撫詳造細数，番商姓名，每年題报。”当时茶馬交易数量是很大的，如康熙二十二年时，“陝西茶課六千七百五十五两六錢，定額二万二千四百引，內易馬二万七百九十六引”①。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內地人民与边疆兄弟民族茶馬交易数量之多。

除清政府規定的場所进行茶馬交易外，各族人民都不辞劳苦，跋涉山川，在各个地方进行各种各样的貨物交換，如“黔楚苗瑤，及西藏‘夷’人，携带貨物，或繩縛头頂，或系絆脊膂……肩挑手挽，劳苦尤甚，然彼徒习以为常，乐此不疲，至金川，……”②。“赴蒙商販，皆以牛車載貨，赴庫伦、科不多二城，輒联数百輛为一行，昼則放牛，夜始行路，一人可御十車，鐸声琅琅，远聞数十里。”③由于汉、蒙两族人民广泛的貿易，以至于有蒙汉人合夥經营生計的。汉、藏两族人民亦如此，藏族人民将他們的土特产如“鹿茸、鹿角、麝香、黃白金、狐皮、羊豹皮、冬虫夏草、貝母”輸入內地，以換取他們所需的茶叶。由于汉藏貿易的发展，出現不少巨商，藏商以“輸入紅花、藏香、各食物为大宗，汉‘夷’交易，或以金錢，或以貨物。”④不少汉族商人，宁愿放弃內地經营，轉向与边疆貿易。如“康熙时有歙县李遴字选卿者，向业販茶，本办安徽腹引，改边地，遂为商首。”青海一带的回族人民也“定期互市于明山”⑤。除蒙、回、藏等族与汉族人民进行貨物交換外，回藏两族人民之間也有密切的經济联系，青海一带的回族人民經常到西藏一带进行貿易。

西南一带各兄弟民族之間和內地的經济联系也很頻繁。川边的貿易以“販牛羊毛革与买換茶叶之商賈为巨，茶店設鑪城，‘夷’人携土产或重資”⑥前往貿易。貴州一带的苗族人民，亦广泛的与汉族人民进行貿易，清江的苗族，“广植树木为业，其寨多富，与汉人往来熟識，可央邻近富戶作保，出树为本，合夥生理或借貨經商，无不应付。”他們“与汉人通商往来称曰同年，爱著戏箱錦袍，汉人多……卖与之”。洪江黎平的苗族，“男子与汉人同，勤耕力作，女善紡織，棉葛巾布頗精細，多售于市，故有洪州葛之名”⑦。还有黎族的人民也經常与各族人民互市，“貴阳山岭多木棉树，黎女群往采之，……織而为布，……賈者則以牛或盐而易之，以售諸市，海南人頗用之”⑧。

边疆如此，內地更甚，住在湘西一带的苗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彼此往来，情同手足。“辰州苗民与汉民交易，輒以牛馬馱載杂粮布絹之物，以趋市集。……届期毕至，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由于苗族不知育种的方法，“春时俟汉人所育之蚕出，輒結伴負籠以貨物易之”⑨。

住在广东的各兄弟民族与汉族往来尤多。增城县山区的瑤民“常跣足入山采樵或攜瓠貯茶以售于市”。江县西山的瑤民‘男子常用簍囊携物，出山貿易”，妇女則“作竹木器，舁負趁墟，以易盐米”。乳源县的瑤民“时有往来城乡与民人市易盐米者”⑩。广东的瑤族人民不仅只与当地汉族人民往来，而且远赴湖南一带經营貿易，販卖貨物。汉瑤两族人民經济往来的频繁，甚至冲破了清政府的禁令，不得不承認瑤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交易的合法化，所謂“給示疏通，民瑤一体赴墟貿易”⑪，就充分可以說明汉瑤两族人民經济交流更加密切了。

住在广东的黎族人民，也“时与郡人互市”，交換貨物及日常用品，互通有无。

不仅是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如此，住在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人民也同样的和汉族人民有着密切的經济联系。清代前期，有关汉人和高山族人进行交換的記載是非常多的，交換的貨物，主要是汉人制造的布四、日常用具及先进生产工具与高山族人的土特产品相交換。如以采硫居台郡的黃職叔就专“购布、油、糖”和高山族人“易硫土”⑫；南路凤山的高山族人常“与汉人交易鉄器、火葯，以为捕鹿之具”，汉族人則又以“珠、米、烏青布、鉄鐺”等去交換高山族人所获得的“鹿脯、鹿筋、鹿皮、卓戈紋”⑬。由于两族人民經济交流的密切，高山

① “古今图书集成”卷二八七，茶部。
② 李心衡：“金川鎖記”卷二。
③ “清稗类鈔”第十七册，农商类。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黔記”卷三。
⑧ “清稗类鈔”第十七册，农商类。
⑨ 同上书。
⑩ “广东省通志”卷三一三。
⑪ 李来章：“連阳八排风土記”卷七。
⑫ “台海使槎录”卷三。
⑬ 同上书，卷七。

族人家中也有了汉人制造的瓷器、釜鐺以及桌椅等使用什物。有些汉人甚至冒着"滩流迅速，船多复溺破碎"的危险，"用蟒甲載貨"到阿里山一带去和高山族人貿易，高山族人也以无比热忱来欢迎，每当"汉人至，則酌酒以待"①。由此可見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經济联系是如何密切的了。

从以上一些簡单的事例可以看出，清代前期各族人民間的联系是很密切广泛的，这种联系不仅促进了各族人民經济的发展，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內容，从而也使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更加巩固和更加发展了。

① "台海使槎录"，卷六、卷七。

"北國春秋"創刊、征稿啓事

一、"北国春秋"为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地方史資料性刊物。它的任务是广泛蒐集、刊載有关河北省（包括天津市）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資料，为編纂地方史志和乡土教材提供資料。本刊由历史教学社出版，天津市邮局發行；創刊号定于九月十五日出版。欢迎訂閱，欢迎投稿。

二、征稿范围：有关河北省（包括天津市）的政治、經济、文化、軍事、外交、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历史資料，資料形式包括：

（1）重大历史事件的調查报告及其考証；

（2）历史事件的回忆录或訪問記；

（3）重要历史人物的傳記、年譜、遺文等；

（4）具有一定历史价値的函电、日記和著述稿本；

（5）史料长編、年表、統計圖表；

（6）照片、拓片和各种文物；

（7）罕見的报章、杂志、書籍；

（8）公社史、工矿史、专业史、各地地方史等。

三、一般稿件在本刊發表，篇幅过长者另印专册。

四、来稿發表后均致送稿酬。未經發表但有保存价値的資料，致送資料費。

五、凡不成熟或不宜公开發表的資料文章，請于来稿时注明，本刊擬不定期印發內部历史資料，以供內部参考。此类稿件的稿酬均按第四項規定致送。

六、来稿請繕写清楚，注明来源，必要时請寄原件，以便核对。

七、来稿請注明眞实姓名，及通訊地点，投寄天津市馬場道188号"北国春秋"編輯部。



苏联学校改革中关于历史教学法的一些問題

A·И·斯特拉热夫

此文原載苏联“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作者A·И·斯特拉热夫同志依据苏共二十一次大会的精神針对苏联历史教学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見。文中提到的若干問題对我們当前教学改进是有参考价值的，因而譯出在本刊发表。讀者在参考本文时，必須結合我国学校的实际情况。有些問題，如加强历史教学的直观性等，也是我們应該努力去做的。另有一些問題，如教学計划和修訂教材，是要貫徹厚今薄古精神的，但如何具体安排，則因学制不同而有些差別，有待于中央教育部的統一修訂和改編；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联系现实，也是我們教师目前普遍注意的問題之一，运用从学习历史而获得的理論知識分析研究现实問題是必要的，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与闡明历史事件，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統一，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历史事件与现实問題，由于时間、地点、条件的不同，应当防止簡单机械的类比和牽强附会。

——本刊編者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宏伟的苏联国民經济发展七年計划，对苏联人民提出了改造我們国家的新的輝煌的任务，它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苏联共产党全面領导苏維埃国家及其經济和文化的发展，党所作出的決議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党所依靠的是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

为了使将来的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为了使国民經济、科学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昌盛，党把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当作目前的重要任务，使青年能够得到很高的普通教育和綜合技术教育，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知識和力量、能力和天才都用在共产主义的建設上。

“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这样規定了苏維埃中小学的主要任务：“培养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公益劳动，进一步提高普通教育和綜合技术教育水平，培养富有教养、通曉科学知識的人，培养青年以深深地尊重社会主义社会原則，并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一代。”（1958年12月25日“眞理报”）

显然，只用旧的教学方法，沿用旧的組織形式是不能解决这項任务的。因此，必須重新审查学校生活和教学工作的一切环节，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相結合的原則运用到学校里来，改变一切学科（历史科也在內）的教材比重、性质、分量和布局。

自然，教师不能不关心这一問題：能否把当前的任务与改革的主要方向規定下来，使学校在进行教育过程的改革时有所遵循呢？没有这样的远景規划，学校的教育体系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学校改革，首先要修改教学計划和教学大綱，

而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資料也应該改变。

我們都懂得，在教学过程中，內容和方法有着首要意义，本文主要是談：历史教学法体系的一些改变应該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

現在，我們从有关历史学的一般問題开始談起，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們更切实地提出改进教学方法的方向。而在許多教学法問題中，我們回顧一下二十年代的情况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学习和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設任务的結合問題；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間从事課外創造性的工作，而压縮实际講授材料的問題；在求得知識方面要求加强学生的独立性；广义的教学"劳动"原則，即在理解历史发展动力条件下考虑教学的具体性和直观性；最后，教师本人不断的創造性的劳动問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培养新的一代，使他們有能力实現伟大十月革命的理想这一任务，而提出来的。

新的方法要求一方面与旧公立学校的教学法相对立，因为它过分地拘束了学生和教师的創造力；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設初期阶段的实証教学法思想，当时宣揚过"統一的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則"，号召培养下一代共产主义的建設者。但是，那些年代教学法上提出的这些要求，要比当时国民經济、社会力量、历史科学和学校設备等所能做到的地步还要广泛。因此，在历史課程的体系中，犯了許多历史科学和教学性質上的重大錯誤（公式主义，对科学知識的意义估計不足，过分地估价了学生独立学习的意义，减小了教师的作用等）。其中許多原理只是形式地实行着，缺乏充足的真正的科学內容。

在三十年代和以后，把使学生获得历史科学的基础知識当作講授历史的中心任务而正确地提出来了，教师和教科书的作用大为加强。这是和历史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的，和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高等学校来培养国民經济和文化各部門質量优秀的工作人員的需要相适应的。中等学校首先被看作是进入高等学校的准备阶段，因此它应当注意的是知識，而不是学生的发展。教学过程普遍表現出来的是以下的公式：教师講，学生听，在家里学課本，在課堂上回答已学过的功課。誠然，在1934年5月16日在苏联人民委員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教授本国历史的決議中，認为教学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使学生牢記基本历史現象和引导学生树立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且作了这样一些著名的教学法指示，即保証学生所必需的历史教材的易于理解性、明确性和具体性，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分析和綜合历史事件。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法体系不是沒有充分地执行，就是以相当低的水平来实現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学生往往只被当作訓練的对象而絕少当作学习的主体。

現在，当全面建設共产主义的时期，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的可能条件比二十年代无比的优越，因此培养青年的任务要以更高的水平进行。

最近几年的历史教育方面应当解决哪些具体任务呢？

在中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分为八年的和九——十一年的）的条件下，历史教材可按圓周式排列，即在前后两个阶段上可以有某种程度的重复。

教材排列的圓周制与"直綫式的"比較起来，需要更多的充裕时間，因为有些問題需要重复地学习。这种配置多少会使学生的兴趣减低，而且教师在选擇不同的材料和决定同一題目講解的不同深度，也是一件特別困难的事。当然，圓周制也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上两度研究历史課程中的同一部分，在第二阶段上就可以依靠初級历史教育已有的水平进而达到更深刻地理解許多历史問題的目的。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进行历史教学計划各种草案的討論，关于这个問題尚未得到解决。可是历史教学計划的某些方面，是需要在新的方法上来解决的。教学計划的这些方面，照我們来看可能是以下几点：（1）不可避免地要把古代和中世紀史課程的內容大加縮减；（2）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当然要在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深度上来学习苏联历史；（3）某些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問題可能按圓周制进行。

历史教材的內容及其在学校課程中的分配、学校改革后历史教学的任务，将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历史教学中的方法体系。为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得到良好的結果，必須：

1.首先要选擇一些基本事实和基本概念，使它們成为逐步形成历史观的依据。对第一阶段的学生来說，許多概念显然不会象第二个教育阶段那样全面和深刻。但是，把生动的事实和理論加以清楚地闡明，就可以弥补这种缺陷。

2.因此，在八年制的学校中必須用造型艺术和文学艺术上的資料增强教材中插图的意义。不系統

地利用直观法，就不会圆滿地完成历史課程的体系和教学中的困难任务。但是在这項工作中，我們不仅有方法上的缺点，而且还有組織上的缺点。我們可以举例如下：（1）我們虽然具有历史事实、事件、現象的教学大綱，但没有历史形象的教学大綱。当然，最初这种"大綱"会是很主观的，但是在将来，它可能不仅是教师的重要参考資料，而且是教科书、画册、幻灯片作者的重要参考材料；（2）最近几年出版的历史挂图，就其內容来看，特别是就其艺术性来看，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它們在許多方面没有把八年制学校历史挂图教学的課題反映出来。現在应該把这些重要的参考資料，例如挂图和其他参考材料，送交給科学研究机关来編纂，而且要在广大教师和历史科学界的监督之下进行；（3）在課內作业或課外作业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很少利用丰富的电影图片材料，許多历史教师大半都用口授的方法講課，他們遭到了正确的非难，他們很少或完全不把过去的实物和历史画（精心搜集的大量历史题材的幻灯片和影片）的复制品透过灯光展示給学生看。最后，学校和課堂上应該有遮光、电綫網、灯等相应的設备，以提高我們学校作业的技术；（4）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問題：是不是应該定一个原則，即所有的学校如果不是必須（不仅是形式上的）供应出版的全套直观参考資料，也应該供給合乎規格的整套資料及必要的設备（校長須負責实际使用）。

3.尽可能地加快历史各个时期的教学进度，因此要求密切注意巩固学生对历史发展阶段分期問题的认識。在教学实踐中或教学法的文献中所出現的年代学問题，必須在研究教学法时加以考慮。过去，甚至在Ф·П·科罗夫金編写的較好的教科书中，除去在教科书的末尾有作参考用的标准"年代"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年代的直观資料。我們的教科书在这一方面比許多外国落后。

4.对于用历史地图来进行工作的方法，也处于混乱状态，尽管在历史教学的直观教具的設备中，历史地图无疑地占了第一位（关于题目的多样性，关于技术的质量，和关于使用的方式）。应当特別地談一談地图，因为地图几乎是没有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应用。中学里历史地图的学习是很不够的，这可以举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对地图的知識的貧乏来說明，而进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学里得到金质奖章或銀质奖章的毕业生。但是年复一年地这些大学生們在地图方面缺乏知識的程度达到令人惊訝的地步。有許多基本的东西，他們既不会确定最簡单的（例如諾夫哥罗德）地理方位。也不会从某一历史地理的形势"抽出"它的历史本质和历史观念来。

在中学里，很少看到用地图来深入工作，特别是要用两、三幅地图，按年代順序悬挂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同时在时間和空間上定出方位，观察历史发展的过程。对于以地图进行工作的办法重視不够，这表現在学校的实际工作中，完全見不到地形图图板这样的参考用品这一点上，这种图板在学生积极地独立工作的条件下，是教授地图知識的好办法。甚至在莫斯科的中学里没有一个学校有这种設备。

5.在現时的历史教学中，应当更广泛地更艺术地使用对比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历史教学中比較难掌握的方法之一，但是使用这种方法，按照教育学的規定用之得当，可能对学生历史思維的发展很有帮助。

采用对比法要注意以下几点：（1）注意所研究的現象发展路綫的联系（起源）。

例如：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起源；工人阶級的起源；某一时期的文化起源等。

（2）注意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現象之間的类似和差异。

例如：把十八世紀末俄国农民的情况和革命前法国农民的情况加以对比；对照三个时期（十八世紀前二十五年，十八世紀后二十五年，十九世紀后半叶）俄国艺术（繪画和建築）的发展等。

（3）注意現代生活中能够与历史联系的現象（前景）。这种对比法只是要使学生的意識面向当代，它可以有助于深刻的理解被研究現象的历史意义。

例如：学生們知道了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以后，就应当不仅看到它的伟大的进步意义（和过去相比），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巴黎公社相比，特别是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美国的內战不仅在美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学生們学习它的时候，同时要让学生弄清楚：由于北方資产阶級和南方种植园主的勾結，人民群众的許多成果都被取消了。这特别是表現在黑人的处境上。"美国資产阶級在'解放了'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資

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达到最可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的目的"（"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13頁，中文版第22卷，第11頁）。教員随后可举出現代美国生活中的实例作为証明。

关于历史和現代的联系，在一些教学法的文章中闡明了这一問題的基本原理。

总結以上所述，必須指出：在将来八年制学校中，在形成历史观念和概念方面要增加困难，在使学生理解历史过程合乎規律的发展方面要增加困难。

在历史教学方法上，应該特别注意广泛地采用直观法。即使可以使用一些类比，但是，我們仍然要重視直观教学法。

同时应用一切方法加强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維，努力使学生在实际上、而不是在表面上掌握历史科学的基础知識。

6.現在我們談一談教育过程的另一方面，談談它的思想教育的作用。当然，历史教育的傳授知識的作用和思想教育作用是彼此分不开的。虽然这样，我們却能把它們个别地抽象出来，分别予以討論。法律的第六条中談道：必須"大力改善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学校要教导学生爱知識、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以无限地忠于祖国和人民的精神、以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精神教养他們。"（1958年12月25日"眞理报"）不难看出，解决上面所列举的各項任务时，历史教学是会起很大作用的（当然，要使用这門課程所固有的一切方法上的特点）。

有的人认为，随着綜合技术教育的开展、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結合，要重新分析和强調的只是綜合技术課程（物理、化学等），但是，这种意見是不正确的。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的結合，学生直接参加农业和工业劳动，要求作更高的思想教育工作。政治思想教育过去是、現在还是学校的中心任务，因而也是历史教学的中心任务。

要使历史課在思想教育上取得成績，需要克服純事实主义和客观地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現象，因此，需要善于从历史材料中作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結論和評价、善于把某些历史問題和我們今天的問題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在今天的現实問題中，反映了我們的世界观、我們的政治观点和我們的道德观念。

这样的历史課是不能有的：例如，講波兰被瓜分的历史，教师只限于叙述其內部生活和外部政治环境，而不引导学生同情在国家民族和文化生活方面受到屈辱的波兰人民的悲剧，何况現在波兰人民又在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我們共同奋斗。

講"巴黎公社"这一节課題时，学生不仅不去分析公社失败的原因，而对巴黎无产阶級的斗争也不致以深切的同情，也不表示仇恨资产阶級的野蛮行为，这样的課程是不能有的。

講授古代卓越的英雄斯巴达卡斯，学生們要贊叹起义者的英勇斗爭，对于斯巴达卡斯的死亡深为悲痛，而对野蛮地迫害参加起义的奴隶的奴隶主則感到无比的憤怒。

教师在介紹二十世紀初的俄国文化时，要揭露一部分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反动的、无原則性的情緒，并指出列宁的令人敬重的坚忍性，因为他在反动派猖獗的黑暗岁月里，善于保存无产阶級政党的战斗力；这样做，教师才能通过講授这一課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这一課在优良教师的手中就会成为培养列宁主义者的眞正营养料。同时，历史課的思想教育的力量也和教师的威信、和教师的思想感情的眞实、和教师之善于以事实說理而不是以詞藻取胜，都是有不可分的联系的。

首先一点在于历史教学和生活的眞正联系，这才是历史教学中这一深刻的党性的基础。

列宁在論青年团的任务这一令人鼓舞的演說中談到：为爭取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爭，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祇有把自己学习、教育和訓練中的每一个步驟同无产者劳动者反对旧的剝削者社会所不断进行的斗爭联系起来"才能学会这一点（"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269頁；"列宁文选"中文版，第2卷，第810頁）。

历史教师遵循着列宁这些原則性的指示，根据劳动者对剝削制度进行斗爭的观点来观察整个历史过程，就能够在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事业中取得許多成就。以劳动和劳动群众的历史来教育学生，培养他們深刻地理解劳动群众作为历史过程基本动力的历史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着历史向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而日益增長，这是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苏維埃时期的历史，研究苏联人民劳动功績的历史，对于使教育和生活紧密联系，特别重要。

我們愿意强調指出：研究劳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教育青年、鼓舞青年在共产主义建設中取

得劳动成績，是一种重大的貢献。

根据同一理由，我們必須考慮一下乡土历史的問題。我們慣于把講授乡土历史看作是苏联通史課程的說明方法，看作是以最近而且可以直接看到的环境为例来把教程具体化的方法。乡土历史的这种作用，充分保持着它的力量。但是，現在必须加强注意，把講授乡土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关于乡土的过去和現在的知識，是我們在参加以劳动来改造那个地方时的必要的知識，因为故乡乃是伟大社会主义世界的活生生的部分。

7.最后，談到历史的教育作用时，必須强調指出，使学生（特别是高年級的学生）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历史教学中，必須把杜絕修正主义思想对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当作自己的任务。

象从来不曾有过的那样，必須把講授苏联宪法和苏維埃法令的要素、把講授共产党作为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中的苏联人民的領袖和組織者的作用，提高到教学法理論的高度。

8.关于教学論問題再說几句話。学校改革声中活跃了关于这个問題的討論。批判了教学的实践，审核了一系列的教学原理。教学实踐当中的缺点，主要的有咬文嚼字、背誦和簡单的重复、学生对課堂作业的消极态度、教师在語言方面的缺点，此外在教师鼓舞学生求知的兴趣和使他們习慣于独立工作、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方面也都作得不够。

教学論中的主要缺点，这里已正确地有所論列。可以把它归結为：过分夸大了知識的作用，而损害了学生独立的創造活动和学生的发展。

有些教师和教学法专家理解到教育学生时要撇开死板的形式，但遺憾的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犯了把教育方法加以鮮明的"超积极化"的毛病。

例如，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通訊院士Б·П·叶西波夫在他的論文"重要的問題"（載1958年12月9日"教师报"）中，不管教学的年級和教学的对象，就以格言的形式拟定了教学方法的公式。

在这一个公式中，沒有把方法和內容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在研究科学原理，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强大力量时，脫离了慣用的和必不可缺少的方針。在学校作业中提到第一位的是"独立获得新知識"；是以合理的方法訓練学生自行监督，开展实踐活动和发展創造力。但教师被引到了新的地位：即不应当多說，而应当多輔导、多指示，他应当避免以自己的解释代替学生的独立工作。在这一个方法的公式中，叶西波夫已經不談他早先談过的很多的口述、談話、直观教具的演示了。

把在課堂上学习課本作为好象是最先进的教育方法（独立获得新知識），近来得到特别大的共鳴。在"历史教学"杂志中也刊載了一些关于这个問題的論文，題目也都具有代表性："五年級至七年級没有家庭作业的历史教学經驗"；"十年級历史課沒有家庭作业后学生的工作"等。有个别教师和教学法专家完全正确地反对压抑学生积极性的某些死板的教育形式和方法，但却把学生在課堂的学习变成了万能的方法。

教科书作为教育学生的有力工具經常引起教师的注意的。它应当在学生的課堂作业和家庭作业中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課堂上，課本只是講課中的主要东西的一部分，它在学生和教师的交往动作中起些作用，在这种交往中教师进行教学、培养和启发的工作。在課堂上，教师首先要使用他的充滿热情的語言，并教导学生掌握这个出色的方法，使学生在自学书籍（教科书，但不仅凭借教科书）和图片的独立工作中，在观察生活現象中（在生产中，在参观中等），在課堂談話中来发展这个方法。把課程局限在按照教科书（从五年級到十年級）解讀的范围內，这就是把課程貧乏化，就是取消了創作性地工作和削弱了博学的历史教师所具有的专長。問題并不在于課堂作业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講解、問詢、直观参考材料的演示等），而在于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內容，在于教师用什么样的方法喚起学生求知的兴趣，使学生有能力分析和綜合历史現象，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緊密地和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的、迫切的任务联系在一起。

（村舍譯自苏联"历史教学"
1959年第2期）

在中國近代史教学中进行阶級观点教育的几点体会

华东师大附中 蔡多瑞

进行四个基本观点的教育，是历史課的重要任务。这四个基本观点的教育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并不是各自孤立地进行的；但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我愿将个人通过中国近代史教学向学生进行工人阶級的阶級观点教育的一些体会提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討。我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做的。

（一）以阶級分析的方法来闡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加深学生对阶級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原理的理解。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个从經济到政治、文化和思想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充滿了复杂的矛盾和斗爭。我們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阶級斗爭的观点来分析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帮助学生掌握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綫索，就不能使学生正确地認識我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規律和科学地理解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綫索，毛泽东同志早就做了精辟的論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結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6頁）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問題在于如何通过教学使学生正确地理解它。在教育革命以前我們曾經存在过一个偏向，在教学中往往只是强調外国侵略势力影响中国社会性質的变化这一面。固然这对帮助学生認識侵略者及其走狗的罪恶、激发学生的阶級情感是起好作用的。但是，相对地忽視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对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那一面是不对的，这就影响了阶級斗爭是“历史的眞正动力”这一原理的闡发，給学生的教育也是不全面的。有一同学曾經反应說：“讀中国近代史越讀越沒劲，因为它是倒霉的历史。”教育革命开始以来，我們注意糾正了这一偏向。虽然由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斗爭发展和变化所形成的两个过程是相互矛盾而又統一着的，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爭，还是我們应該着重講述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資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什么它們始終不能达到瓜分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目的呢？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每一次反侵略战爭和人民的政治运动都多少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削弱了封建主义的統治，促进了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发展，拖延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轉化过程。因此，我在講述这些战爭和政治运动，特别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三次高涨时，都突出地闡述了中国人民英勇斗爭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例如講义和团运动，我就指出：这一运动，使侵略者認識到中国四万万人民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誰若敢于“瓜分中国”，誰就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它所表現的“生杀予夺，皆在团”的声势也大大动摇了清朝政府的統治，加深了滿汉貴族之間的矛盾，更削弱了清中央政府的权力。迫使清政府在事后不得不撤消了一些反动措施（当然这与戊戌变法也有关系），对民族資本主义的压制也有某些放松，使民族工业得到較前有利的发展机会。

除了着重說明阶級斗爭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以外，我向学生也着重講述了在这一阶段历史中阶級关系的变化和阶級斗爭形势的发展。鴉片战爭以后，随着外国資本主义經济的侵入，中国原来的自給自足經济遭到破坏，中国社会經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阶級关系和阶級矛盾的变化。这种阶級关系的变化、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集中表現为历次革命运动高潮的来臨。因此，我一方面給学生指出，这一阶段历史的根本变化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农民阶級与地主阶級之間的矛盾轉化为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在講述三次革命高潮时，围繞这一根本矛盾的轉化，叙述和分析了每一次革命高潮前后阶級关系和阶級力量配备的具体变化情

况，使学生逐步認識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級关系和阶級斗爭的变化和发展規律，認識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比如对第二次革命高潮前的阶級关系和阶級力量的配备，我在講述过程中进行了分析，并在总結这一阶段历史时，指出：这一时期由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的阶級斗爭的陣容发生了变化，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产生了，反映民族資产阶級要求的政治派別出現了，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展开了政治活动，改良派的維新变法运动失敗了。当然，在这一时期里，义和团运动仍是主要的革命运动，农民阶級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不能忽視已經增添了的新內容，农民战爭已不是近代阶級斗爭的唯一形式了。这一时期的阶級关系和阶級力量对比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是显然不同的。通过这样一些分析，学生就会理解到，由于新的阶級的产生，阶級关系的变化，阶級斗爭的內容也就跟着发生了变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阶級斗爭是社会历史的主要內容。

（二）对学生有計划地进行无产阶級及其政党是中国革命領导者的教育。

培养学生的工人阶級的阶級观点的最基本的內容之一，是使学生从感情上到理性上都承認工人阶級是最先进的阶級，唯有中国工人阶級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領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一客观眞理。这一眞理可以說是中国近代八十年的历史总結，有大量史实可以做証明。我在教学中是通过以下几点来帮助学生認識这一眞理的。

第一，分析近代阶級形成的历史，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級形成的特点，从而使他們認識工人阶級是中国革命的領导者的客观性。我在分析这一問題时，主要依据毛主席的指示：分辨誰是革命的敌人、朋友和領导者，要从中国社会各阶級的經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去分析。經过分析，农民阶級的革命性、弱点和主力軍地位，民族資产阶級的两面性等可以一目了然了，中国无产阶級和国际无产阶級共有的先进性和自己独有的特点也都可以揭示出来，对于哪个阶級能够領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用中国近代革命的具体史实証明只有工人阶級才能領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中，工人阶級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我是抓住农民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表現从反面来說明的。一方面历史主义地肯定农民和民族資产阶級在斗爭中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指出他們的阶級局限性。例如講太平天国革命，我就抓住天朝田亩制度和太平天国的內訌与失敗来分析这一革命运动失敗的阶級根源，使学生認識到这一农民革命运动的規模是宏伟的，它曾經把旧式农民战爭所能达到的成就推到了最高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沒有工人阶級的領导，而始終沒能摆脫农民阶級的局限性，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以后講各民族起义和义和团运动时，再巩固学生这一認識。对民族資产阶級，我是通过以下两段历史来分析的。在講戊戌变法时，一方面指出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向西方寻求眞理企图挽救中国淪为半殖民地的命运的愿望是好的，另一方面指出他們幻想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改良政治，就能发展資本主义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講辛亥革命，分析同盟会綱領和同盟会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表現时，一方面要指出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資产阶級政党，同盟会綱領是資产阶級革命的政治綱領，有它的进步意义，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有功績的，但也要指出另一方面，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資产阶級表現的其他种种弱点。归結起来，我指出这两个政治运动說明他們的領导者都沒認清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眞正敌人是誰，可依靠的眞正革命力量是誰，也沒有彻底解决問題的决心和办法。因此，解决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只有等到中国工人阶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誕生，并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武器来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的时候，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并把中国革命引到完全的胜利。

第三，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来論証革命領导权必然属于中国工人阶級。在講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的历史时，一方面指出在国內，經过一系列的斗爭，中国农民阶級的革命运动失敗了，資产阶級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也先后失敗了，資产阶級正处于絕望状态，找不到新的出路，而这时候中国工人阶級的力量却已經壮大，开始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将要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另一方面指出在国际，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世界已处于資本主义决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只有在无产阶級領导下走俄国人的路的新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其他任何阶級不可能担負起領导中国革命的責任。

（三）教育学生运用阶級分析的方法来評价历史和观察社会現实。

站在不同的阶級立場、具有不同的阶級观点，衡量历史現象的是非标准也就不同。少奇同志教育我們說：“由于社会各阶級的人們有不同的利益、

要求、思想和习慣，如是，各阶級的人們对于社会历史上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經济、文化等等，就有各种不同的观察方法与处理方針。”（“論共产党員的修养”，解放社1949年版，第106頁）因此，教育学生站在工人阶級立場，运用工人阶級的阶級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历史現象和社会現实是历史課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在指导学生以工人阶級的阶級观点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是这样做的。

（1）让学生明确評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告訴学生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反动，什么是革命。195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的社論指点給我們一个十分明确的标准：“历史是向前运动的。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地打破旧制度，創造和发展新制度，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違反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新制度产生以前頑固地維护旧制度，在新制度产生以后破坏新制度，企图恢复旧制度，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根据这一标准，我告訴学生在观察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首先要弄清它們发生或产生的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什么，然后具体分析这一事件这一人物是傾向那一方面的，他的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代表反动的方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众代表进步的方向，凡是反帝反封建的都是进步的，反之都是反动的。有些人物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我們要具体分析，看他主要是属于哪方面。例如林則徐，属于地主阶級，与农民阶級有矛盾，但他在反抗外国侵略者这一方面与地主阶級妥协派的态度和作用不同，他的主張他的行动符合当时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他应該算是一个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进步人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的阶級局限性，不能做过高的評价，否則不能理解他在其他方面不利于人民的表現。

再有，历史車輪是不断前进的，任何人不継續前进就要落后。因此我們还要教育学生以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些历史人物的活动，在一定时期里可能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有一致之处，因而在这个时期說他是进步的；但在另一时期，由于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他轉而代表与人民对立的阶級的利益或他所属的阶級与人民之間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而他坚持这个阶級的立場，这时他就成为反动的人物了。戊戌变法时和立宪派与革命派斗爭时两个不同时期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历史作用的不同，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2）揭露和对比各阶級在某一历史事件中所表現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培养学生爱憎分明的阶級情感。現以鴉片战爭为例来說明这种做法。对禁烟問題，各阶級的看法相差甚远。清政府中的投降派以穆彰阿为代表，認为禁烟“有伤国体”，“丧失大宗收入”；抵抗派以林則徐为代表，为了挽救“兵弱銀荒”，則主張严禁鴉片；广大人民認为“鴉片輸入，騙我錢財”；英国资本家則認为鴉片的輸入是“文明”“自由”的行为。战爭发生以后，林則徐認为“号召民間壯丁，已足制其命而有余”；琦善則認为外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广大人民則感到“家家田廬須保卫，不待鼓声群众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鋤在手皆兵器”；英国侵略者認为战爭是由于“中国无理”而造成的；伟大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对英国的侵略性質給以无情的揭露，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則給以无限的同情和正确的估价。在这方面，反映历史实际的文艺作品往往給我們提供不少可用的材料。

批判歪曲历史事实、顚倒是非、抹煞历史規律的资产阶級历史观点，也是論証不同阶級有不同观点的方法之一，有助提高学生分析历史現象的能力。在不增加学生負担的条件下，适当地做还是可以的。

教育学生运用阶級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現实問題，是历史課应該做的事情之一，我在这方面是这样做的：

（1）教育学生体会党怎样运用阶級分析的方法分析問題，制定方針和政策。这样做可以提高学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时加深学生对党的方針政策的理解。

（2）教育学生以阶級观点来观察当前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政治問題，使他們学会运用从历史課学习到的理論知識“解剖”当前的社会現象。

（3）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阶級观点教育。使他們学习运用从历史課中获得的思想武器来分析批判自己的一些不正确的認識，解决自己的实际思想問題。

以上所述，都是我在教学实踐中的一些粗淺的体会和不成熟的做法。我在通过历史課向学生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时，深深感到自己树立四个基本观点的必要性。比如，我們要想使学生很好地受到工人阶級的阶級观点教育，那就要求我們教师自己首先要有鮮明的工人阶級立場、观点和思想感情。我觉得我們应該朝这一方向努力不怠。

对历史教学中貫徹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几点認識

趙恒烈　張习孔

一

历史教学工作和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一样，必須以党的教育方針为指导，結合本科特点，使学生获得巩固的系統的历史知識，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和四个基本观点，逐步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一年来，大家在向学生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就認識的发展过程来看，据我們了解前进是波浪式的。在开始时，大家对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認为四个基本观点教育在每堂課中都有，应是平均分配。基于这种認識，在課堂上往往出现浮夸附会，外加与教材无甚关系的政治尾巴的現象。如有人講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的农业集体化时，指出这是在布尔什維克党和工人阶級領导下发动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与富农阶級进行了尖銳的斗爭的結果（阶級观点和集体观点），农业集体化后，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劳动观点），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最后还向学生指明这里包含着四个基本观点教育，需要大家好好体会。另外也有人認为四个基本观点教育在每堂課中不能应有尽有，但必具有其一。基于这种理解，在課堂教学上往往出现强调一点、不及其余的現象。如有的教师講中国同盟会綱領，只着重批判了資产阶級的妥协性，但却避而不談它是一个“民主主义的革命綱領”。教师自認为是站在工人阶級立場与資产阶級思想进行斗爭，而不知这种不全面的認識，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以上两种看法都带有片面性和主观性。我們認为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是历史教学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主要內容，它应体現于整个教育过程中，并与教材內容密切联系。因此，某些課中不可能都具有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內容，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基本观点教育的內容，企图作某种机械的規定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共同組成部分，它們是互相关联的，任何割裂的做法的本身都是違背辯証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貫徹四个基本观点教育中的片面性和主观性表現的另一种傾向是：有的教师只强調发揮教材內在思想性，强調潛移默化，而忽視联系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認識实际来进行思想教育。应該說自从整风反右以后，随着历史教师思想的提高，在忽視当前的政治傾向上是有很大扭轉的，但无可否認，还有少数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因循旧章，“关起門来成一統，管它春夏与秋冬”。这种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必然削弱历史教学的政治性与現实性，遺害无穷，必須大力加以糾正。与此相反，有的教师对“厚今薄古”方針理解得不正确，无論講古今中外历史，过去的一带而过，現实的滔滔不絕，忽視了教材的深入分析，沒有把历史知識的傳授和思想政治教育統一起来。我們認为以上两种看法都有它正确的一面，但又都有它的片面性。正确的看法应該是充分发揮教材內在的思想性是根本的，但恰当地联系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認識实际也是需要注意的。

二

运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教材講深講透，使材料和观点統一，是貫徹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基本途徑。

四个基本观点教育主要是通过課堂教学来进行的。在历史課的課堂教学中主要应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則来解釋历史，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

观規律性，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因为这样就闡明了人民群众和阶級斗爭在社会历史中的眞正作用。思想教育与教材是紧密相关的，如講"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不闡明"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英勇斗爭及其与工农相結合的道路，那就无法引导学生向"五四"和"一二·九"时代的青年学习和継承他們与工农相結合的光荣傳統。1898年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运动具有爱国进步意义，但在此以后的君主立宪派則愈来愈向反动方面发展，若不講明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深入分析当时国內外的具体情况，就无法向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由于教材本身原即蘊含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因素，因而教师在課堂上深入分析教材，把教材講深講透，使材料和观点統一，是貫徹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基本途徑。但講深講透了教材并不等于四个基本观点教育完全体现于其中，教师还必須根据教材本身具有的思想教育內容有意識有重点地发揮某些部分，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里說的有意識有重点地发揮的部分，并非是只进行某一个观点的教育，而不考虑其他。教材本身蘊含的思想性，往往不是单一的，因此在考虑通过教材分析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时，也就不能只考虑某一方面。講課中的重点与輕点犹如戏剧中主角和配角的关系。唱西廂記，得有張生、鶯鶯、紅娘、老夫人等，但張生鶯鶯是主角，其他是配角。沒有主角，配角就上不了台，沒有配角，主角也演不成戏。自然主角的台詞多，出場的机会多，是戏中的中心人物。在貫徹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时，根据教材內容突出某一个或几个观点教育，把它作为主角，使一堂課的思想性更突出、更显明，这是非常必要的。把其他有关的部分，当作配角，用来烘托重点，使教材中的全部思想教育都能充分地发揮出来，也是不可缺少的。

历史教材是按着年代次序編写，具有严格的系統性。課堂教学也是一堂課一堂課来上的，有一定的程序。因此，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安排也应是有計划的，有系統的，使其循序漸进，逐步深入。在备課时，首先应考虑到每一册书中具有哪些教育內容，其次再考虑到每一单元中具有哪些教育內容，最后考虑到每一課时中具有哪些教育內容，使得每一观点教育都得到統筹安排。如在中国近代史中，揭露資产阶級的两面性，进行阶級观点教育，必須在下列各单元中，即在（1）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产生；（2）戊戌变法；（3）辛亥革命；等单元中有系統有步驟地进行。这三个单元揭示資产阶級两面性的角度各有不同，其內容逐漸深化。第一，主要从資产阶級的产生，从該阶級在政治上，經济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千絲万縷的联系加以說明，指出它的两面性是先天的。第二，主要从部分資产阶級和地主阶級領导的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質及其失敗中加以說明，指出它的两面性在改良主义运动中的表現。第三，主要从資产阶級領导的辛亥革命过程中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妥协，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而最后走向失敗加以說明，指出它的两面性在領导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表現。

三

历史教学的目的，主要是要通过具体史实教导学生認識人类社会发展規律，使他們認識現实的由来和明确将来社会发展的趋向，从而鼓舞他們积极地为实現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認識如果基本上正确的話，那末在历史教学中通过联系現实的途徑来达到貫徹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目的，就有其重要的現实意义。

教学上的联系現实問題反映着教师的政治立場問題。我們与資产阶級教育家有原則上的分歧，我們不是为講历史而講历史，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了解現实才去研究历史。講历史是为了批判地継承过去有用的东西，是从現实的需要出发。我們說的联系現实，主要指的有两方面，一是社会現实，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革命，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等当前国內外的政治斗爭和生产斗爭；一是学生实际，即社会現实反映在学生思想和学习中的实际，包括对历史問題的認識。无論从哪方面联系都必須做到"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所謂"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教学目的的需要，結合教材內容毫不牵强的进行联系，从而加强学生的思想認識。所謂"有的放矢"，就是要据根学生的思想实际，在教学中有目的有計划地进行联系，决不是灵机一动，兴之所至，外加标签，生拉硬扯。

要做好联系現实，我們必須坚持貫徹群众路綫的教学方法，必須經常深入了解学生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的情况，在备課中充分考虑到，要通过

这一段教学解决什么問題，达到什么目的，使学生受到什么教育等等。由于学生有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其中非无产阶級和非历史主义观点又不是絕无仅有，因此我們有責任針对他們存在的思想認識問題帮助分析解决。这也是"因材施教"吧！如有的学生認为"西安事变"不应当放走蔣介石；有的学生对党在幼年时期內部出現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思想，并且占据党的領导地位感到无法理解等等。这些問題都需要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正确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分析解决。解决問題的过程，就是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过程。

联系实际的做法虽然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但总的来說，是应随着当前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学生的思想实际的变化来丰富教学內容，达到貫徹四个基本观点教育的目的。今天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日千里地在前进，世界的形势也是日新月异地在发展，教师要不落后于現实，必須亲身参加現实的斗争，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上眞正做到联系現实。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联系現实而破坏教学的系統性。历史終究是历史，不能当政治課来講。有些学校在政治运动到来时，結合运动的中心，組織专題报告，这种做法是否恰当，需要作具体分析。我們認为，向学生进行四个基本观点教育，是一种經常性的而又十分細致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密切結合教材內容，有計划有步驟地进行，天長日久，才可能收到潛移默化之功，不能把它理解簡单化。但是为了适应現实政治的要求，把教材中的有关部分集中起来，在課外組織一次科学的系統的历史知識講座，从而来說明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如有的学校曾結合反对美帝侵占台湾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叛乱事件組織过台湾和西藏是我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专題报告，也是可以的。但这只能視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能作为經常的主要的教学方式。

联系現实的方法既然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各人可以大胆独創，这里就不想一一罗列了。其中关于类比和对比，在历史教学中几乎应用得最普遍，把性質相近的、时代不同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較，如果做得恰当，是可以收到好的教育效果的。譬如講"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意义，联系到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发表的两个宣言，以闡明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发展和伟大胜利，这种联系在教学上有启发作用。但应当竭力避免牽強附会地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現在来比的做法。比如講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硬要拉扯着与今日的人民公社作类比，不但不必要而且也缺乏思想性。性質根本不同的历史現象和事件，是否可以用对比的方法来对照說明呢？我們認为，这也要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論。比如講資本主义国家長期的严重的經济危机，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热火朝天的經济建設，以闡明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講解放前我国农民在落后的个体經济制度下的貧困生活，联系今天我国实行人民公社后人民的丰衣足食，以闡明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这都是很好的例子。至于不分輕重，不加抉擇，非历史主义地濫加对比，就不恰当了。如有人拿王安石的"青苗法"和解放后的"农业貸款"相比附，这样一方面会大大削弱了教学的思想性，同时也影响学生对这两个概念的正确理解。因此，我們認为运用类比和对比进行思想教育，必須持愼重的严肅的态度，認眞考慮，不要犯反历史主义的錯誤，造成不良影响。



建立校史館結合教学的經驗和体会

浙江省温州一中历史教研組

温州一中創办于1902年，迄今已有五十七年的历史，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傳統。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温州解放，温州一中的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参加革命斗爭，許多校友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貴的生命。为了貫徹党的教育方針，便于在教学中結合运用这些校史材料，以帮助学生理解全面的历史，受到思想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最近我組在学校党政的支持和領导下，实行师生合作，建立了温州一中校史館。并在建館及結合教学的过程中获得一些收获和体会，現簡介如下：

一　建館的經过和史料的陳列

我校校史館的建立，是在学校党支部的直接領导下进行的。由历史教研組全体教师并发动一些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組成了一个乡土研究小組，具体負責搜集和整理有关校史的材料。經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已于本年三月十五日正式建成开放，展出的校史資料将近一千件。

我們把这些資料，是以两条道路斗爭为中心，划分了几个时期来整理的，突出学生运动，把本校的、温州的以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有机地結成一体，使学生認識乡土历史是全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紧紧地随着祖国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我們編繪了一套系統的校史图，共三十三張；五套校友烈士的画傳，共十八張。

为了便利观众参观和講解員講解，我們尽量把实物陈列在有关的图解旁边。例如，当我們講到“一二·九”运动，在图旁就把当时温州学联的宣言、东洋堂的照片、本校罢課罢考的通告、校刊等，統統有顺序地放在一起。又如在校友郑振鐸的画傳旁边，我們陈列了郑振鐸先生的照片、他毕业时的同学录、考卷、“五四”运动时期他在温州編輯的杂志，以及最近中央文化部贈送給本校的“郑振鐸先生傳略”和“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这样，观众們看了之后便可以得到一个比較深刻的印象。教育的效果可能会更大些。

在建館的过程中，我們还得到市教育局、市图书館、文管会和烈士館的帮助，給我們提供了有关的資料和綫索。从本校图书館，温州档案室中也找到不少重要的史料。校友，老年教师，烈軍属及全校师生也都把他們所珍藏的文献捐送給校史館。其中如“五四”运动期間温州出版的进步期刊：“救国講演周刊”、“新学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温州学联出版的“五一”、“五卅”特刊；蔣介石发动“四·一二”叛变前夕印成的“一年来温州学生运动之經过”一书；“一二·九”运动时期本校罢課宣言照片，东洋堂的照片，反內战反飢餓时温州学联印发的宣言；校友謝文錦、金貫真、郑杂臣、蔡雄等烈士的革命事迹及其遺著等，都是十分宝貴的革命史料。我們还从其中选出十余件資料，献給了温州区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委員会。

市教育局很重視我們这个工作。在紀念“五四”四十周年的时候，市教育局指定以我校校史館为中心，联合二中、四中和师院举办了“温州学生运动展覽会”。这个展覽会并且配合了高初中中国現代史的教学，对全市学生进行了一次革命傳統的教育和乡土教育。

二　运用校史資料进行历史教学的一些做法

（一）我們利用校史資料充实課文內容，对学生进行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把祖国历史和本校校史联系起来，对学生进行必須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我們把温州市和本校学生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跟全国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学生明确这些斗爭都是全国革命斗爭的一部分。使他們不仅在理解全国性的历史事件时更加具体化，而且对历史事物产生亲切感。例如講到“五四”运动时，就結合当时温州学生响应“五四”运动，組織温州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罢課，示威游行，抵制日貨、进行宣傳等情况，特别指出本校学生組織“十人团”下乡进行爱国反帝的宣傳，是温州先进知識分子和广大劳动群众相結合的开始。

当我們講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波及溫州时，就介紹了校友郑振鐸等暑假由北京回到溫州，和十中、十师的师生共同发起組織新学会，出版了"新学报"，积极提倡新文化，热烈歌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活动情况。

又如，当講到"五卅"惨案发生后的情况，便举例說明溫州学生、工人跟全国各地人民一样，掀起了一个反帝高潮。我們曾举了这样一个具体的实例：当时溫州教会学校——艺文中學学生，因反对該校校長蔡博敏（英国人）阻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而集体离校。本校同学立即予以大力支援，热情招待。溫州各界爱国人士，則特地創办欧海公学（即溫州四中的前身）收容这批学生。

当我們講到"一二·九"运动及反內战反飢餓运动时，也結合了一些有关溫州和本校学运的情况以激发学生积极投入各項爱国运动的热情。

（2）运用以两条道路斗爭为中心的校史資料，对学生进行阶級斗爭的教育。

我們运用以两条道路斗爭为中心的校史資料，对学生进行阶級斗爭的教育，使学生認識党領导人民进行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仅是人类历史空前伟大的事业，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事业。它必須經过長期艰苦斗爭的历程方能实現的。

例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叛变以后，溫州反动派也进行了白色的恐怖統治，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員和革命志士。那时候，本校学生蔡雄——中共溫州独支青年团书記，在十分恶劣、危險的环境中，坚持革命斗爭，主持出版秘密的油印刊物"照胆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王超凡等的罪行，号召溫州人民起来参加保卫革命的正义斗爭。

又如，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內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动专員張宝琛和平阳反动县長張韶舞，实行大規模的"清乡"，杀死群众五百余人。本校党支部立刻号召党員和进步同学，开展对敌斗爭。他們于"七七"紀念日的深夜，在欧江小学門口張貼了"中国共产党告民众书"的街头墻报。

1947年5月，全国大、中城市掀起了波涛洶湧的人民反內战运动，溫州学生立即响应。本校学生自治会在党的領导下，沿街張貼标語，反对征兵征粮，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視，并向我校进行威胁，声言要施行鎮压手段，但是同学們并没有被嚇倒。

經过以上事实的講解，能进一步激发学生的阶級感情。

（3）运用校友烈士的革命事迹，教育学生应継承和发揚母校光荣的革命傳統，从而对学生进行爭取讀书、思想、劳动三丰收的教育。

当我們对学生介紹校友郑采臣烈士的革命事迹时，就着重地指出，采臣同志在校讀书时十分認真，学习目的性很明确。正如他当年写的詩句說："身体好何用，头顱在亦羞，男儿不努力，壯志何能酬！"可見他的志愿是多么崇高。"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发生的那一天早晨，杭州反动軍队，首先包围省党部，搜查郑采臣家庭。那时省委书記华林，委員庄久恭等三位同志正在采臣家里举行会議，他把华林等同志藏于密室，为了掩护这三位同志，自己却在反动軍队进行搜查时，挺身而出，厉声說道："我郑采臣在这里，用不着搜查了。"他就这样地被捕了，而华林等同志因此幸免。郑采臣同志为了党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了，表現了共产党員最高貴的品質。

又如介紹校友蔡雄的革命事迹，指出他在校讀书时非常勤奋，但不是个死讀书的人。从校刊上可以看到蔡雄同志当年写的許多文章，这里面充分表現了他的革命人生观和为实現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因而他能在"四·一二"白色恐怖統治下，毫不畏惧地担負起最艰巨的任务，設法营救被捕同志，印发刊物，尽情揭露和斥責"清党委員"的滔天罪行。后来，他不幸被捕了，遭受反动派的严刑拷打，遍体鱗伤，大腿被打断；但蔡雄同志忠貞不屈，始終未供一詞。

此外如校友謝文錦，金貫眞，陈砾如等烈士的許多光荣事迹也都是教育学生的好材料。

（4）运用新旧社会对比的方法，使学生明确解放十年来祖国建設的伟大成就，从而对学生进行热爱共产党和热爱新社会的教育。

单从教育事业的发展来看，溫州市解放十周年来各类学校学生人数的增長，就是一个惊人的成就。1949年溫州还沒有幼儿园，而至1959年幼儿园已有儿童16,858人；1949年小学生不过9,396人，1959年增至68,840人；中学生1949年仅2,392人，今年則有11,146人。过去溫州沒有大专学校，今年已有四所大专学校，此外还有不少的业余学校。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教育方針的正确指导下，本校的面貌已煥然一新。解放前高中毕业

生每年人数只不过四五十人，現在高中每屆毕业生有五百余人。去年全校师生一千多人，創作了三万多首詩歌，十多个剧本，民間故事百余篇，小說十来篇，散文五千余篇。在科学研究方面，到今年3月底，試制成功140項新产品，这里面有許多是尖端产品。这些成績，在解放前是不能想象的。

校史館的建立，不仅在历史教学中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对政治、語文等科的教学也起了很好的輔助作用；也为編写校史，收集乡土資料以及进行科研活动等，創造了有利条件。

（二）校史館是上中国現代历史复习課的好課堂。

校史館开放后，我們曾組織有中国現代史課程的高二、高三共18个班級的同学，利用課余时間先后到校史館去上了一次参观課，目的是向学生进行一次革命傳統教育与乡土教育。

我們进行的步驟是：教师首先要做好教学的准备工作。課前先到校史館里熟悉陈列的材料，选擇其中与課文內容有关的和学生应該知道的材料。同时与校史館負責同志共同备課。这样一方面能充实教材內容；另方面可以交换意見，使写出来的教案能够更好地联系实际。

第二步，在校史館进行教学。学生們一到校史館，看到琳瑯滿目的画片、书刊等，往往会分散了注意力，因此教师特別注意抓紧組織教学这一环节，向学生說明来这里上課的目的要求。然后教师就对着校史图和有关的实物，有顺序地进行講解，同时联系旧課进行复习。教师講解后，学生对校史館展出的內容已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就让学生分組参观，使他們自己把刚听到的东西，再巩固一遍。这时候学生会提出許多問題，教师就給予解答或說明。

学生們反应，这种活动对他們很有帮助。

三 几点体会

（一）依靠党的領导，是我們办好校史館的保証。

溫州一中有五十七年的悠久历史，在反动統治的黑暗年代里，許多校史資料，特别是学运斗爭的資料，橫遭禁毁，丧失殆尽，只有解放后的今天，在党的重視和支持下，我們才能从无到有地建立了校史館。在建館的过程中市教育局历史教研室曾給我們作了許多宝貴的指示，并提供了許多資料；本校党支部和校長經常給我們以鼓励和指示。因此，使我們能在短短的时間內取得比較显著的成績。

（二）必須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綫，采取“三結合”的方法，来建立校史館与編写校史。

校史館的建成，除了党政領导同志的支持和关怀外，是和全校师生的援助分不开的。当校史展出以后，教师与同学还陆續送来許多資料，有的同志来館参观后，回去便檢出十多件宝貴的資料，如溫州大专以上学生联合会維护航权的宣言、照片和公章等，捐給本館。有些同学参加了校史編写和校史館的布置工作，他們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地完成了“五四”运动在溫州；“解放十周年溫州一中校史”；解放前溫州一中四十七年校史等的編写与“在战斗中成長的溫州一中”（校史图）的繪图工作。

（三）参加校史館工作，对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丰富业务知識很有帮助。

过去，我們在介紹校史时，只說学校創办于某某年，和創办人是某某等等，毫无阶級分析意味。在这次筹备校史館的展出时，我們对党的教育方針又进行了学习，对校史应包括的內容作了討論，因此对我校建立的历史，就能初步給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提高了我們的思想水平。我校的前身是溫州府中学堂，是在1902年王琛任溫州知府时由中山书院改建的。当时正是辛丑和約签定之后，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統治的新的斗爭正在醞釀，清政府感到很大的压力，为了緩和这种局面，不得不进行一些表面性的改革，因此才有办学堂的做法。我校第一任負責人——学堂总理是孙詒讓，是一个从封建統治阶級分化出来的資产阶級改良主义者。学堂里的科目，有經史、掌故、西政、西艺、輿地、算学和洋文等七門，新旧两种思想从一开始就在学堂里展开斗爭。

另外，最初我們选擇的校史資料，只是阶級斗爭方面的，没有考虑結合生产。經过学习，我們重視了有关生产的材料，补充和丰富了校史館和教学的內容。例如革命烈士郑采臣改进草蓆生产的故事就是很生动的一个事例。郑采臣同志为了提倡国貨，努力改制溫州草蓆，使它的质量和日本草蓆相比美。后来他又突破重重技术关，制成花蓆，从此溫州花蓆便暢銷全国各地，成为溫州的特产，这些事情，我們过去是不大注意的。

（馮 坚·执笔）



图 四



图 五



图 六

〔以上各圖說明見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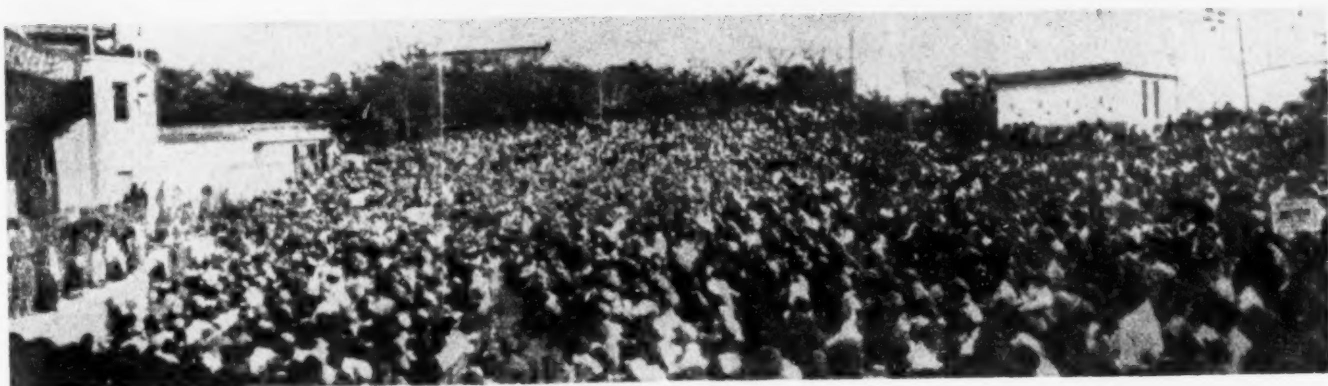


图 七



图 八



图 九



图 十

1950年下半年和1951年上半年，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鎮压反革命运动。鎮反运动貫徹了“鎮压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采取了专門机关和發动群众相結合的群众路綫的方針，集中打击了还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革命分子，使全国社会秩序空前地安定下来。〔**图七**〕北京市举行鎮反大会；〔**图八**〕上海綸昌紗厂工人举行鎮反控訴大会；〔**图九**〕一位身受迫害的老大娘当場控訴特务分子的罪行；〔**图十**〕中国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管会軍法处法庭判处一批反革命罪犯死刑。